

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 及相關問題*

謝明良**

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擬針對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收藏的一批由臺灣海峽打撈上岸的越窯系青瓷，以及《越窯在澎湖》一書所載錄採集自澎湖的越窯系標本進行分類，並在分類的基礎之上結合其他考古資料以及幾件帶有「永」字款的越窯青瓷，檢討以上兩批標本的年代問題。結論認為，上述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標本的年代跨幅較大，包括晚唐以迄北宋等各時期的作品，但以北宋初期的標本佔絕大多數。

關鍵詞：越窯、臺灣海峽、澎湖、青瓷、沈船

* 本文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補助「探索臺灣海峽和澎湖發現的越窯系青瓷」專題研究計劃 (NSC90-2411-H-002-051) 之部分成果，特此申謝。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 一、前言
 - 二、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
 - 三、考古所見越窯細線劃花裝飾——
兼談澎湖採集細線劃花標本的定年問題
 - 四、有關北宋越窯和「永」款越器的幾個問題
-

一、前言

臺灣海域發現來自中國浙江省的越窯系青瓷一事，可說已屬舊聞。早在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古物市場就屢次出現傳說是臺灣海峽打撈上岸的唐宋時期越窯系青瓷；現歸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收藏的三十餘件器形大體完整的越窯碗、盤等器皿，也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循古董販子所提供的線索購自臺灣西部嘉義東石、布袋一帶的漁民。回想我當時訪談漁民所得到的粗略印象，陶瓷等海撈文物集中見於網蝦業者，這可能和網蝦下網較深一事有關，網獲的地點大約是在東石外海與外傘頂洲之周邊地區。東石沿岸有海防單位監控，所以我是在好幾年之後才在張幸真（現為臺灣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同學的安排下獲得海防部隊的通融，雇船赴外傘頂洲一窺究竟，但沙洲上除了少數幾件近代青花瓷片之外，別無其他古瓷標本。

另一方面，臺灣外島澎湖也曾發現不少越窯系青瓷標本，其中又以陳信雄《越窯在澎湖——五代十國大量越窯精品的發現》一書所載錄的標本最為人們所熟知，數量也最為龐大，據說有三千餘件。⁽¹⁾雖然陳氏並未公布標本的具體採集地點，不過臺大藝術史所收藏的另一批總數三十餘件的越窯系青瓷殘片，則是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陸續採集自澎湖中西村沿岸地表，部份標本得自中屯嶼，後者有的夾雜於宋元時期瓷片堆積層中。

(1) 陳信雄，《越窯在澎湖——五代十國大量越窯精品的發現》（臺南：文山書局，1994），頁168。

本文的目的，是擬針對臺大藝術史所收藏的上述兩群得自臺灣海域且尚未正式對外公布的越窯系青瓷，做一分類介紹。其次，在分類的基礎之上，隨處檢討臺灣海域越窯系標本的年代問題。

二、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

如前所述，臺大藝術史所收藏的該類遺物計二群。其中臺灣海峽打撈品器形大致完整，以碗類居多；另一群澎湖採集品雖也是以碗、盤類佔多數，但均屬殘片。為了方便敘述以及編年上的需要，有必要先對兩群標本進行分類。儘管當今學界充斥了僅僅依據自身的偏好或習慣性的觀察重點的五花八門、令人眼花撩亂卻乏實質意義的分類方案，我仍然深信合理的分類不僅可以概括、突顯作品的特徵，同時還能和學界以往的分類成果接軌，以便促進彼此的溝通並勉力將特定的器形分類予以補強或完善化。就此而言，分類方案本身即是學者心血的結晶，我雖極樂意援引前賢的分類成果，但因各地遺址出土標本不盡相同而難以生搬硬套。以下本文的分類即是考量臺灣遺存標本的現存情況，著重參考森田勉的方案，⁽²⁾ 而森田勉方案可說是在龜井明德的分類基礎上進一步的完善，⁽³⁾ 並由山本信夫做了必要的補充和修正。⁽⁴⁾

臺大藝術史所收藏的臺灣海峽打撈品計 35 件，器種分別是碗（32 件）、洗（2 件）和盤（1 件）；澎湖採集標本總數近 30 件，可確定屬碗盤類的標本計 24 件，注子 2 件，其餘或因殘片器形或窯屬特徵不明顯，在此只好割愛，不予討論。姑且不論偶然的成分，臺大藝術史所收藏的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顯然以碗

-
- (2) 橫田賢次郎、森田勉，〈大宰府出土の輸入中國陶磁について——型式分類と編年を中心として〉，《九州歴史資料館研究論集》4（1978），頁 1-26；森田勉，〈毛彫文様のある二、三の青磁について〉，原刊於《古文化論叢》6（1979），頁碼不詳，後收於中島恒次郎、森田レイ子編，《大宰府陶磁器研究——森田勉氏追悼論文集》（福岡：森田勉氏遺稿集・追悼集刊行會，1995），頁 101-108；森田勉，〈北九州地方から出土する越州窯青磁の様相〉，《考古學ジャーナル》臨時増刊號（1982），頁 15-21。
- (3) 龜井明德，〈日本出土の越州窯陶磁器の諸問題〉，《九州歴史資料館研究論集》1（1975），頁 51-97，後收於氏著，《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 49-93。
- (4) 山本信夫，〈北宋期越州窯系青磁の検討〉，收於中島恒次郎、森田レイ子編，《大宰府陶磁器研究》，頁 181-197；山本信夫，〈大宰府出土施釉陶器の編年について〉，《國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82（1999），頁 123-202。

盤類佔絕大多數，而從作品施釉和裝燒方式看來，基本上可以區分為三類，即：I類，除了圈足著地處之外，整體施釉；II類，除了圈足著地處之外，器內底有呈環狀排列的疊燒泥痕；III類，整體施滿釉，僅外底心有支燒泥痕。

(一) I類

碗，4件（臺灣海峽打撈2件，澎湖採集2件）。從圈足造型特徵可予以中分類（1型），再依據口沿或器身的花口等裝飾予以小分類（a、b式）。則4件足端之外餘施滿釉的I類碗，足端均較寬，介於璧形足與細圈足之間，即所謂的環形足（1型）。其中，澎湖採集品僅存器底殘片，無法判明口沿和器身原貌，可暫列入a式，至於臺灣海峽打撈品則於口沿切割成花式口（b式）。後者I1b式碗碗外壁花口正下方另捺划豎稜，故內壁相對部位隆起凸稜。澎湖採集的2件I1a式碗釉色偏黃；臺灣海峽的2件I1b式碗則施罩青綠色釉，胎土緻密，呈青灰色調，經復原可知為五花式口，其中一件口徑15公分、底徑6.8公分、高6.2公分（圖1）。

參酌以往學者的分類方案，則本文的I1a式、I1b式碗相當於龜井明德AII1、森田勉I2、山本信夫I2和土橋理子IB1等碗式。⁽⁵⁾就可確定其相對年代的日本出土例而言，福岡縣大宰府藏司遺跡標本屬九世紀前半作品，⁽⁶⁾但集中見於長岡京右京九条三坊南方SK6901、⁽⁷⁾大宰府右京五条四坊、⁽⁸⁾大宰府學校院東邊部等九世紀後半至十世紀遺跡。⁽⁹⁾個別標本，如年代約於十一世紀的平安京左京四条三坊五町出土例，⁽¹⁰⁾則可能為傳世後所遺棄。

(5) 龜井、森田、山本的分類請參見本文註2-4各氏論文。土橋理子的分類可參見：土橋理子，〈日本出土の古代中國陶磁〉，收於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奈良、平安の中國陶磁》（京都：臨川書店，1993），頁211-249；土橋理子，〈初期貿易陶磁器〉，收於中世土器研究會編，《概說中世の土器、陶磁器》（京都：真陽社，1995），頁457-469。為免繁瑣，以下除非必要，不再重覆註明上述分類方案的文獻出處。

(6) 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54年度發掘調查概報》（福岡：九州歷史資料館，1980），頁52，圖35之71。

(7) 大山崎町教育委員會，《大山崎町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集》4（京都：大山崎町教育委員會，1984）。此轉引自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頁247。

(8) 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60年度發掘調查概報》（福岡：九州歷史資料館，1986），頁17。

(9) 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56年度發掘調查概報》（福岡：九州歷史資料館，1981），頁72。

(10) 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京都市埋藏文化財調查概要（昭和57年度）》（京都：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1984）。此轉引自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頁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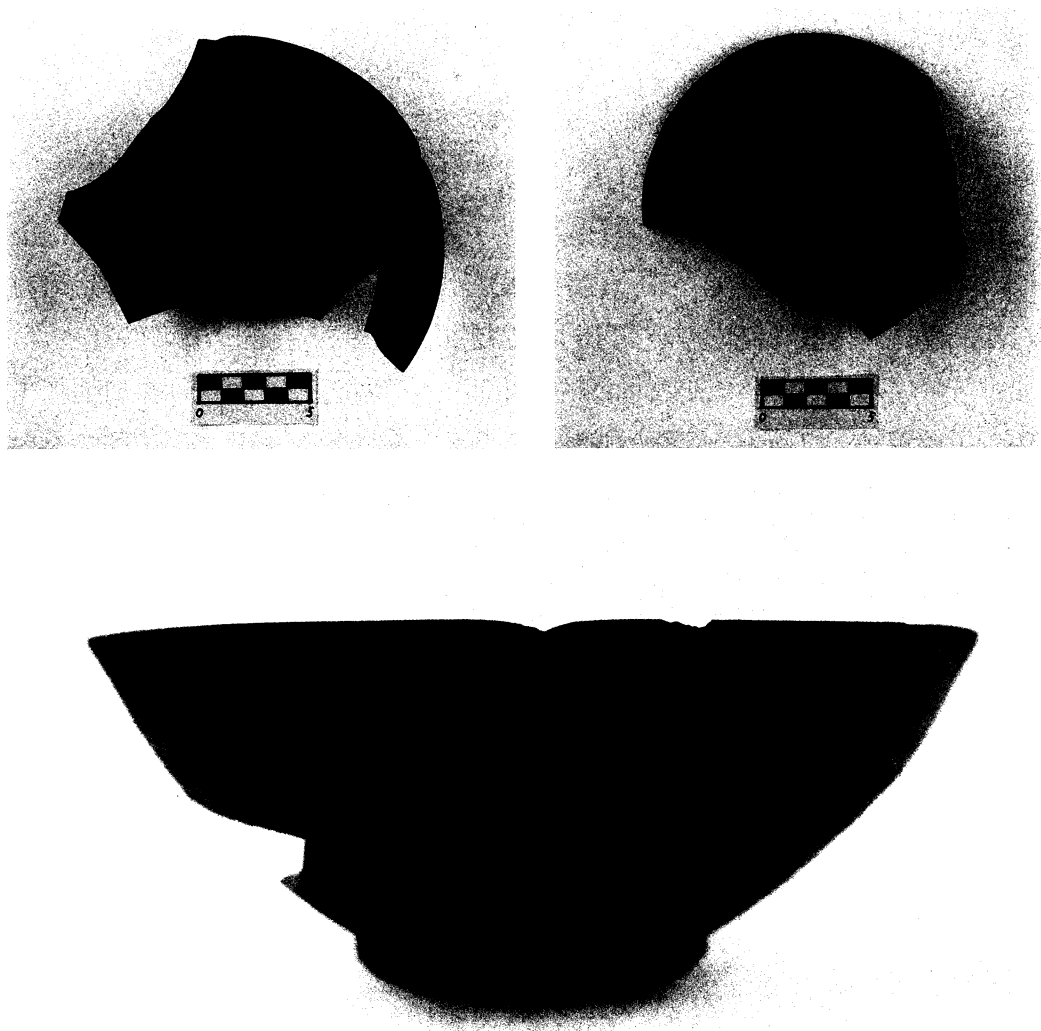


圖 1 I1b 式碗（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另一方面，儘管在口沿和器腹等細部特徵上彼此之間仍有差異，但和臺灣海峽 I1b 式碗器大致相近之出土例亦見於中國考古遺址，如江蘇鎮江第 20 號晚唐墓，⁽¹¹⁾ 或洛陽後梁開平三年（909）高繼蟾墓。⁽¹²⁾ 上述中國出土例的相對年代和日本遺跡所見大致相當，即約於九世紀後期至十世紀的晚唐、五代時期。

(11) 劉建國，〈江蘇鎮江唐墓〉，《考古》2（1985），頁 134，圖 5 之 12、15。

(12) 朱亮等，〈洛陽後梁高繼蟾墓發掘簡報〉，《文物》8（1995），頁 54，圖 3 之 5。

(二)類

碗，計 139 件。這類足端無釉，內部底留有疊燒泥痕的 II 類碗，可以依據支燒痕跡進行中分類（1、2、3 型），並依口沿特徵歸納小分類（a、b 式）。

III 式碗，計 18 件（臺灣海峽打撈 2 件，臺大澎湖採集 9 件，陳氏澎湖採集 7 件）。該式碗底足亦呈環足，碗心泥點呈松子狀，泥點個數不一。以兩件臺灣海峽打撈品為例，內底心泥點分別為 10 處和 12 處。相對於足牆上方與外底接處角度和緩，外底心往往修整成平齊內凹的小鏡面。碗壁造型不一，一件敞口弧腹，釉色青中偏黃褐，口徑 16.8 公分、底徑 8.3 公分、高 5 公分（III 式）（圖 2）；另一件深腹碗（III 式），碗壁斜直，釉色灰綠，口徑 16.6 公分、底徑 8.3 公分、高 7 公分。另外，近年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發掘澎湖中屯遺址（ATP1）出土的越窯系青瓷碗（編號 CUT-A10110p069）也屬本文的 II 1 式。⁽¹³⁾

類似的作品，分別見於龜井 AIII、森田 I2、山本 I2a 和土橋 Ic 等各碗式。早在一九七〇年代森田勉已經指出，該式碗於日本國分寺遺跡雖是和八世紀後半的土師器共伴出土，但流行於十世紀。⁽¹⁴⁾ 山本信夫在歸納諸多考古實例之後，也認為該式碗於日本始見於八世紀末期遺跡，流行於九世紀後半至十世紀中期。⁽¹⁵⁾ 除了日本大宰府右京五条四坊、⁽¹⁶⁾ 福岡縣下山門等遺跡之外，⁽¹⁷⁾ 中國亦見類似造型的青瓷碗式，如會同五年（942）耶律羽之墓⁽¹⁸⁾ 和浙江臨安板橋五代墓，⁽¹⁹⁾ 可惜後兩例發掘報告書未提及碗內底是否亦見支燒泥點。

墓葬之外，越窯上林湖窯址（Y51，EII 式碗）⁽²⁰⁾ 和寺龍口窯址（T4 ㉓，B 型 III 式）⁽²¹⁾ 亦曾出土器形相近、且內外底均有支燒泥點的作品。依據報告書的分

(13) 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組，《澎湖內垵中屯歷史考古研究成果報告》（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3），頁 75；頁 147，圖版 106-108。

(14) 橫田賢次郎、森田勉，〈大宰府出土の輸入中國陶磁について〉，頁 23。

(15) 山本信夫，〈北宋期越州窯系青磁の検討〉，頁 192。

(16) 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 60 年度發掘調查概報》，頁 17。

(17)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下山門遺跡》（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23 集，1973）。此轉引自榎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頁 59，圖 84。

(18) 齊曉光，〈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1996），頁 16，圖 55。

(19) 姚仲沅，〈浙江臨安板橋的五代墓〉，《文物》8（1975），頁 71，圖 5。

(20)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37，圖 14 之 7。

(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63，圖 37 之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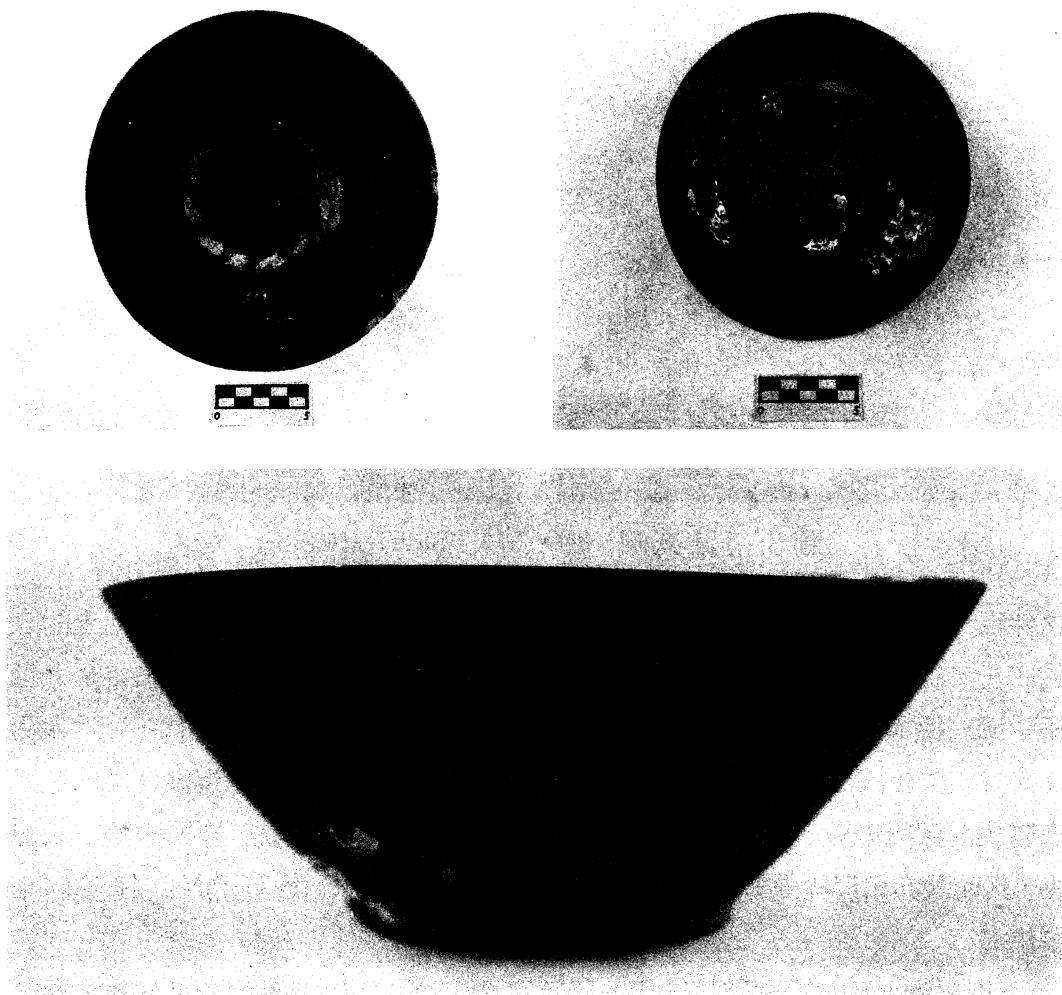


圖 2 III 式碗（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期，前者上林湖窯址標本屬後段四期，年代在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中期；後者寺龍口窯址標本屬該窯第二期，相當於五代吳越國早中期（907-960 年）。這樣看來，日本和中國考古資料均表明，與本文 III 式碗器式相近的作品之年代，雖可上溯八世紀後半，但較常見於九世紀至十世紀前半遺址。值得一提的是，波斯灣著名的對東方貿易港尸羅夫（Siraf）遺址亦見同類碗式，其內底心不僅有 10 處環形排列的松子狀泥點，外底心亦旋修出小圓形鏡面（圖 3）。⁽²²⁾ 由於是和長沙窯彩繪瓷

(22) David Whitehouse, "EXCAVATIONS AT SĪRĀF Fourth Interim Report," *IRAN IX* (1971), p. 1. IX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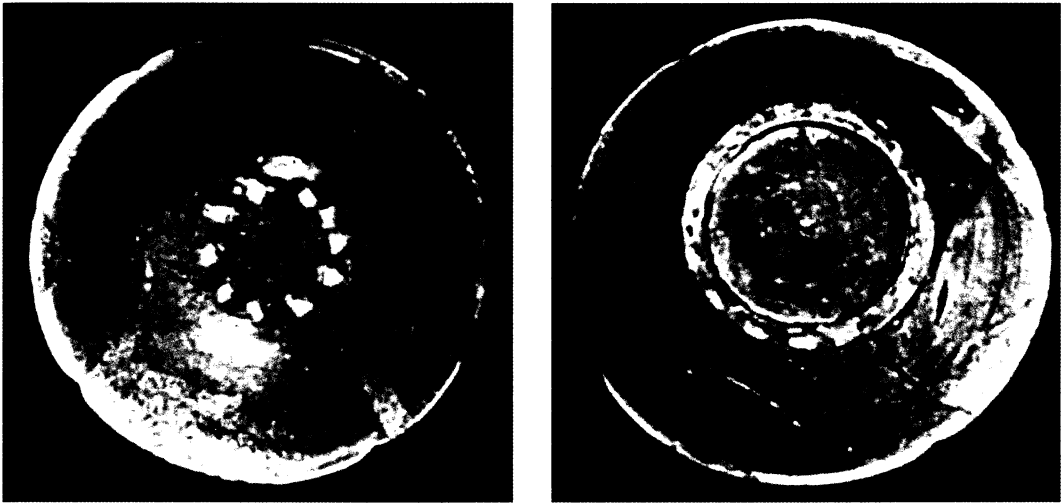


圖3 III1式碗（伊朗尸羅夫〔Siraf〕遺址出土）

共伴出土，可知其相對年代應在九世紀。關於這點，我們從尸羅夫遺址出土的上述四花口碗之四花裝飾較流行於唐代，並曾見於上林湖四期（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中期）標本，⁽²³⁾亦可間接推測得知。另一方面，早在一九七〇年代，三上次男就表露出對於該類碗式的高度興趣，並指出尸羅夫遺址出土品應屬浙江婺州窯系東陽象塘窯所燒製。⁽²⁴⁾雖然象塘窯址出土青瓷碗內底亦見環形排列的松子狀泥點，其碗式亦和尸羅夫遺址標本相近，⁽²⁵⁾但詳情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調查資料來解決。

II2式碗。由於分類不同，因此除了臺灣海峽5件以及臺大澎湖採集8件之外，陳信雄得自澎湖的53件「多條短線支燒痕的圈足碗」和41件「六段支燒痕的圈足碗」當中，有一部份作品是相當於本文的II2式碗，但確實數目不明。

該式碗底足著地處無釉，足端呈環形，內底有圈形排列的疊燒泥痕，其與III1式碗的區別所在是前者泥痕呈條狀。以臺灣海峽打撈上岸器形大體完整的作品為例，造型和尺寸各不相同，器壁有的斜直外敞（圖4），也有的於口沿以下弧形內收，前者釉色青灰，口徑17.5公分、底徑8.4公分、高6.8公分，後者釉帶黃褐色

(23)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頁104-105。

(24) 三上次男，〈イラン發見の長沙銅官窯瓷と越州窯青磁〉，《東洋陶磁》4（1977），頁18。

(25) 朱伯謙，〈浙江東陽象塘窯址調查記〉，《考古》4（1964），圖版陸之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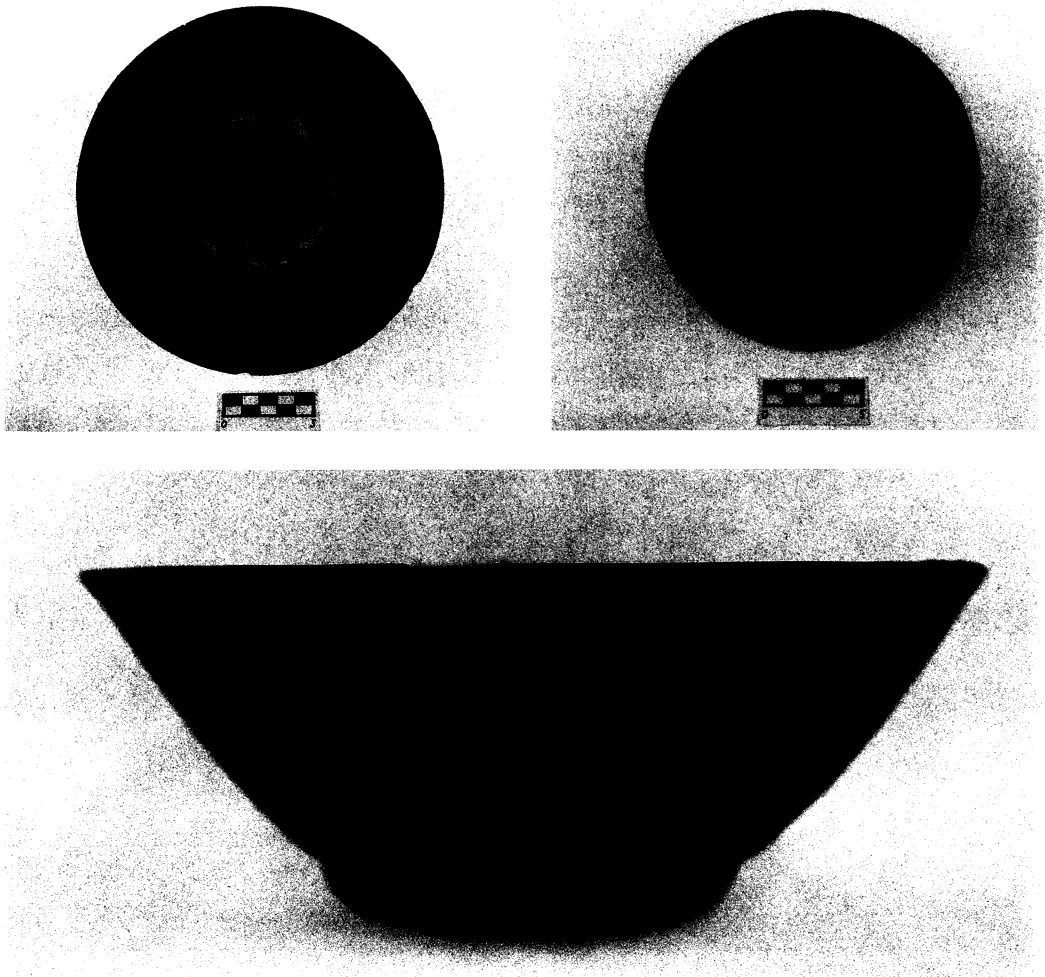


圖4 II2式碗（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調，露胎處呈灰白色，口徑 19.2 公分、底徑 8.7 公分、高 8 公分。作品底足旋修規整，足牆上方與外底一交接處往往切削銳利，略呈直角。II2 碗式約相當於龜井 AII2、森田 I2、土橋 IB2 各式，龜井認為其年代約於十世紀中期，森田等的編年也顯示其相對年代在九世紀後半至十世紀。除了福岡縣大宰府或鴻臚館等著名遺址之外，福岡市德永遺址更出土數十件完整器，報告者從共伴遺物推測，認為其年代約於九世紀中期至後半期。⁽²⁶⁾

(26)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德永遺跡 國道 202 號線今宿バイパス關係埋藏文化調查報告 II》（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第 242 集，1991），頁 111。

II3 式碗。除了臺灣海峽 10 件、臺大澎湖採集 2 件之外，陳氏澎湖採集的總計 94 件「多條短線支燒痕」和「六段支燒痕」圈足碗當中，有的亦屬本文的 II3 式碗。該式碗的環形足端無釉，內底心亦見間斷式圈形排列的泥條支痕，其裝燒特徵和本文 II2 式基本相似，不同的是 II3 式碗碗心與碗壁接處設陰刻弦紋一周，碗心形成大鏡面與碗壁明顯區隔。該式碗的碗壁造型和尺寸不盡相同，但以敞口、弧腹造型居多，釉色青灰或泛黃褐，足端旋修不夠規整，環足著地面寬窄不一。可確認的作品多於外底留下小臍眼。依據口沿和碗壁特徵，又可細分為直口無裝飾的 II3a 式碗（圖 5）和口沿切割出五花口的 II3b 式碗（圖 6）。II3a 式和 II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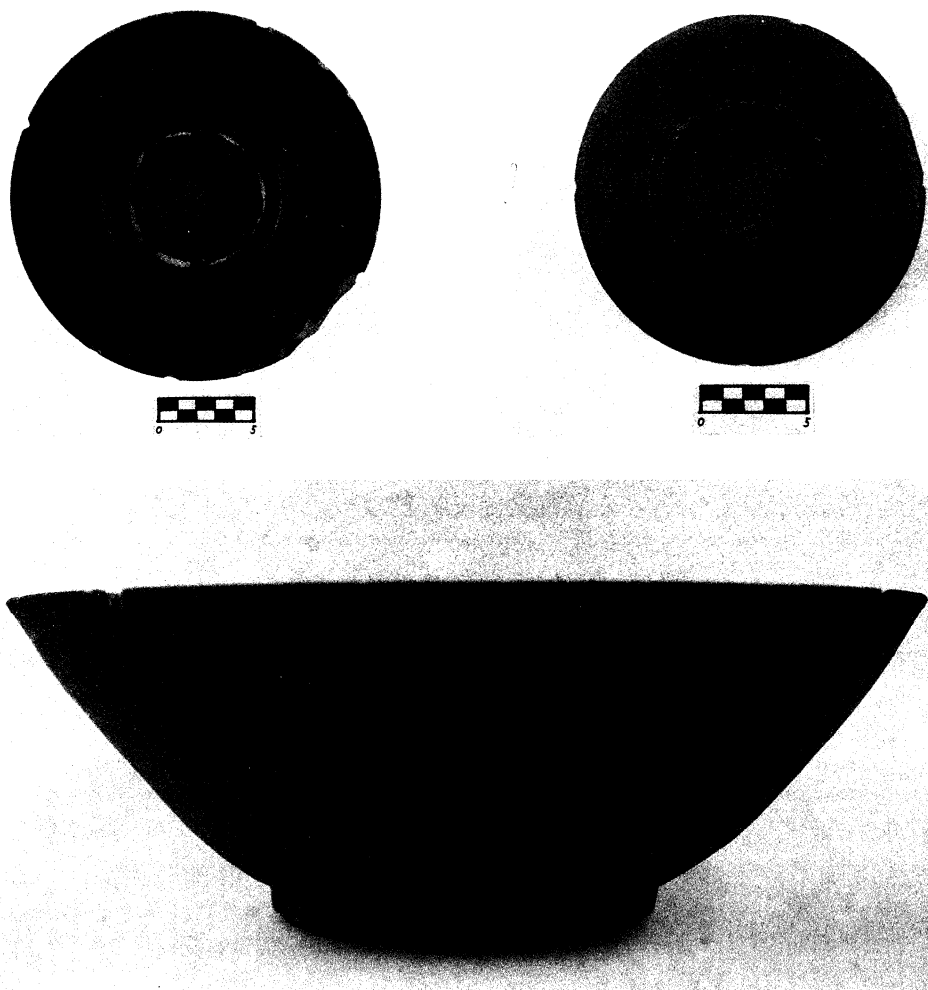


圖 5 II3a 式碗（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式碗基本可涵蓋龜井 A-III、森田 I2 以及土橋 Ic 式碗或 I2 式盤。日本福岡縣海的中道遺跡、⁽²⁷⁾ 多々良込田遺跡⁽²⁸⁾ 曾出土內底碗壁下方陰刻弦紋形成鏡面的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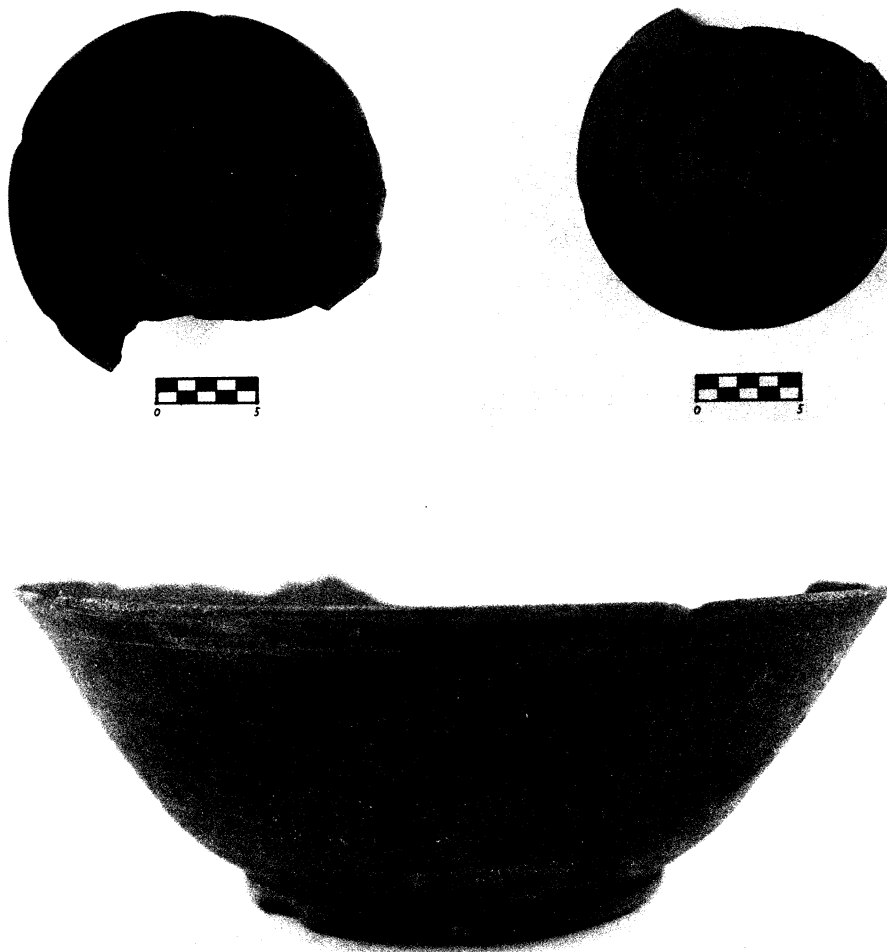


圖 6 II3b 式碗（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 (27)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海の中道遺跡》（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87 集，1982）。此轉引自榎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頁 36，圖 51 之 29。
- (28)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多々良込田遺跡 II 福岡市東區多の津所在遺跡群の調査》（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53 集，1980）；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多々良込田遺跡 III 福岡市東區多の津所在遺跡群の調査》（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121 集，1985）。此轉引自榎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頁 39，圖 54、6。

越窯上林湖窯址亦見類似碗式，後者之相對年代約在八五〇至九〇〇年之間。(29)

(三) III類

整體施滿釉僅外底心有支燒泥痕的 III 類標本數量不少，可分為兩群，一群是臺大藝術史所的臺灣海峽打撈品（13 件），另一群則是澎湖採集品（臺大採集 4 件，陳氏採集 2,344 件）。由於澎湖採集品數量多，種類豐富，所涉及的議題相對較多，故擬留待次章節再予以討論，以下僅先就臺灣海峽打撈品做一介紹。

碗，10 件。滿釉，僅外底心有造型不一的或呈條狀或略呈松子狀的支燒泥痕，可確認的作品之支燒泥痕均為 4 處。細高圈足，足牆上厚下窄，旋修規整，內底與器壁接處飾弦紋一周。直口，口沿尖薄，以下弧度內收，露胎處呈灰白色（圖 7）。類似的碗式大致相當於山本 IIIA、土橋 I3 皿以及越窯上林湖窯址報告書所分類的 I 式碗和 III 式盞，後者上林湖標本的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後半。(30) 由於與本文 III 式碗圈足造型完全一致的作品當中，有的於圈足內陰刻「太平戊寅」（978 年）年款（圖 8），可知其相對年代也約於十世紀後半。其次，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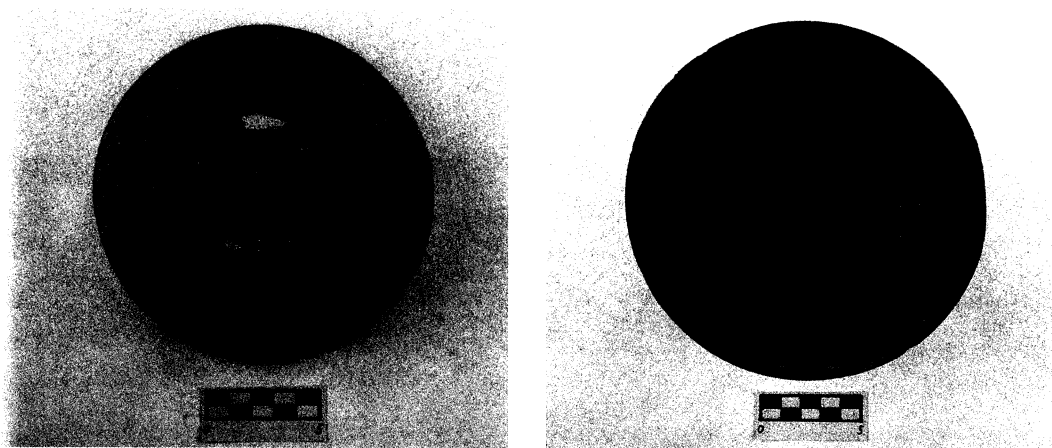


圖 7 III3b 式碗（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29) 森達也，〈越窯青瓷碗的兩個體系——玉璧底碗和圈足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5（2002），頁 144，表 No. 13。

(30)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頁 100，圖 53 之 5、彩圖 13 之 6；頁 110。

山本信夫的排序，其可能是從同氏所分類的碗 I2bア，即本文所分類的 II1 式碗逐漸發展而來的。(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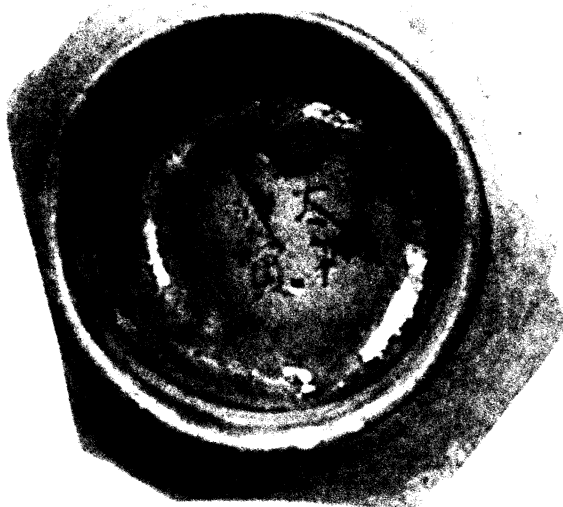


圖 8 「太平戊寅」(978 年)銘殘片 (中國浙江省上林湖窯址出土)

盤，1 件。薄胎，敞口，口沿以下弧度內收成平底，底部近器壁處旋修出凹面，形成低淺的臥足。內底與器壁接處陰刻弦紋一周，外壁口沿下方及近底處亦飾弦紋。剝釉嚴重，但仍可看出原施罩滿釉，釉青中偏灰色調，足端內圍有支燒泥痕，外底心釉下陰刻「吉」字 (圖 9)。類似造型的越窯青瓷淺臥足盤曾見於浙江臨安五代墓，(32) 越窯寺龍口窯址出土的相對年代在北宋早期 (960-1022 年) 的 I 式碟，以及於盤底陰刻「太平戊寅」款的 AC 型 I 式盤之造型特徵 (圖 10-1、10-2、10-

(31) 山本信夫，〈北宋期越州窯系青磁の検討〉，頁 184；頁 185，圖 2 之 1。

(3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杭州、臨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圖和秘色瓷〉，《考古》3 (1975)，頁 191，圖 9 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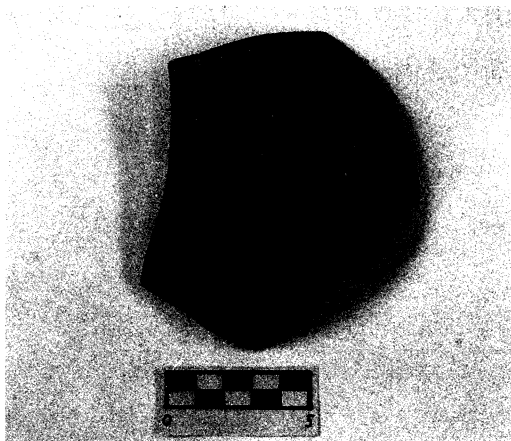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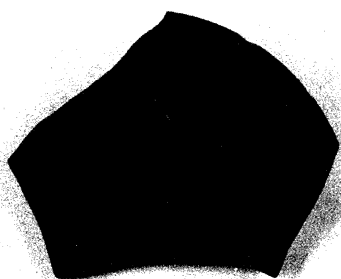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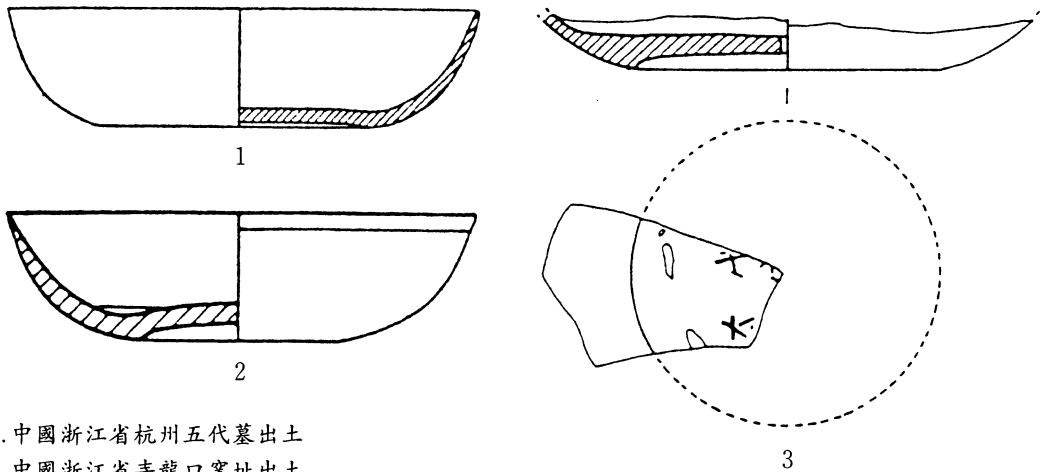


圖9 「吉」字銘盤殘片(III類)(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3)，⁽³³⁾基本上也和本文這件 III 類盤一致。

洗，2 件。可依紋飾的有無再區分為 a 型（素面）和 b 型（帶紋飾）。IIIa 式洗，薄胎，露胎處呈青灰色。直口外翻成折沿，口沿以下弧度內收，底置向外翻卷的細高圈足。從圈足造型特徵結合偶可見到器足脫落的國外公私單位所藏類似作品，可知圈足與器身是分別製成後再接合而成，也因此足壁往往留下略顯變形

(3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頁 120，圖 71 之 2；頁 368，圖 180 之 4。



1. 中國浙江省杭州五代墓出土
2.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窯址出土
3.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窯址出土

圖 10

的按捺整修痕跡。滿釉，釉色青綠，內底以弦紋做出鏡面，外底有六處環形排列的泥條痕，底正中釉下陰刻「汝」字（圖 11）。類似造型的折沿洗見於龜井皿 IIb、森田 III 類等十世紀中期標本，前引浙江臨安五代墓⁽³⁴⁾和越窯上林湖、⁽³⁵⁾寺龍口窯址⁽³⁶⁾亦見類似標本（圖 12-1、12-2、12-3）。其中寺龍口窯址標本有的於外底陰刻「太平」字款，結合不少底刻「太平戊寅」款的圈足部位殘件，其圈足造型因亦和本文 IIIa 式洗基本一致，可知「太平」款應是「太平戊寅」的省寫。

IIIb 式洗。帶細線刻花裝飾的 IIIb 式洗，直口外翻成折沿，以下弧形內收，器底置外卷的圈足，從足牆上厚下窄的造型特徵看來，整體應是以轆轤一次旋修而成。器外壁粗線陰刻仰蓮瓣一周，內底細線陰刻花卉波濤紋。剝釉嚴重，但仍可看出原係滿釉，外底有環形排列的支燒痕（圖 13、14-1）。浙江鄞縣窯址曾出土類似造型和劃花裝飾的作品（圖 14-2）；⁽³⁷⁾日本大宰府湯納遺跡亦見類似的越窯系細線刻劃花青瓷標本，依據共伴出土的土師器編年可知其年代不早於十世紀中

(3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杭州、臨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圖和秘色瓷〉，頁 191，圖 9 之 2。

(35)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頁 75，圖 37 之 6。

(3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頁 368，圖 180 之 2。

(37)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伯謙等），〈浙江鄞縣古瓷窯址調查記要〉，《考古》4（1964），頁 185，圖 5 之 1（I 式鉢）；李輝柄，〈調查浙江鄞縣窯址的收穫〉，《文物》5（1973），頁 33，圖 7 之 1（XVII 式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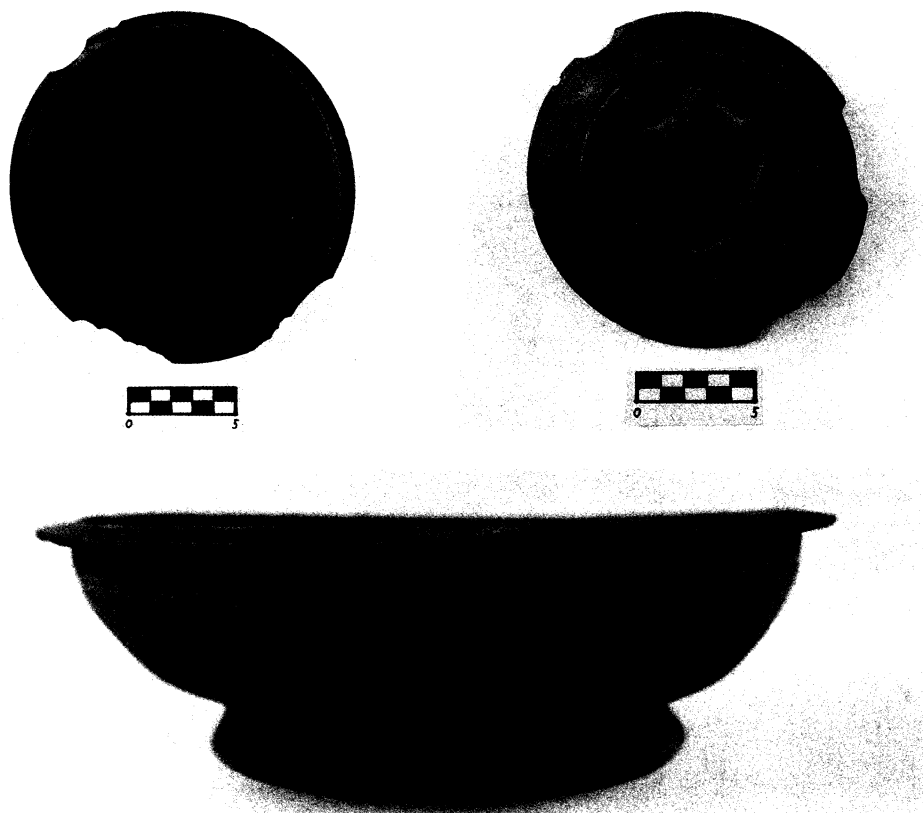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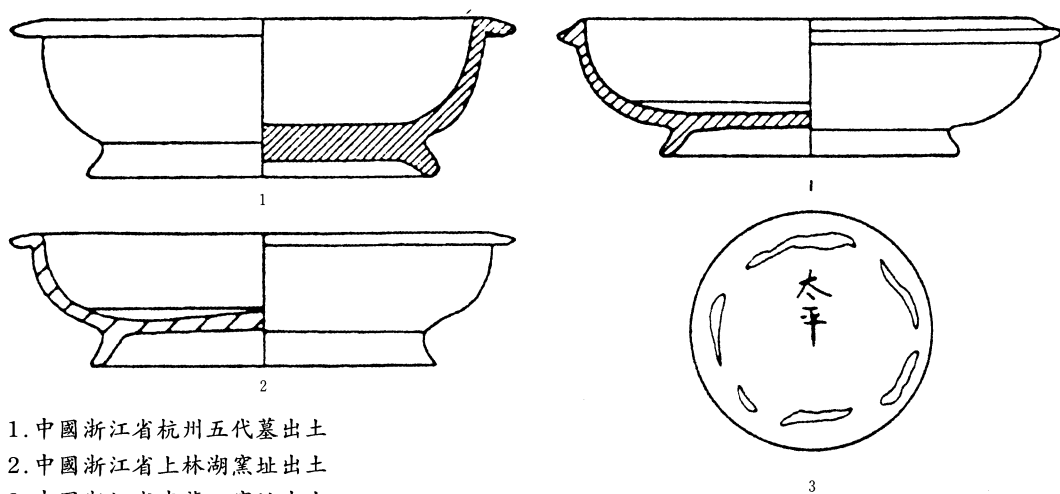


圖 11 「汝」字銘折沿洗(III類) (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1. 中國浙江省杭州五代墓出土
2. 中國浙江省上林湖窯址出土
3.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窯址出土

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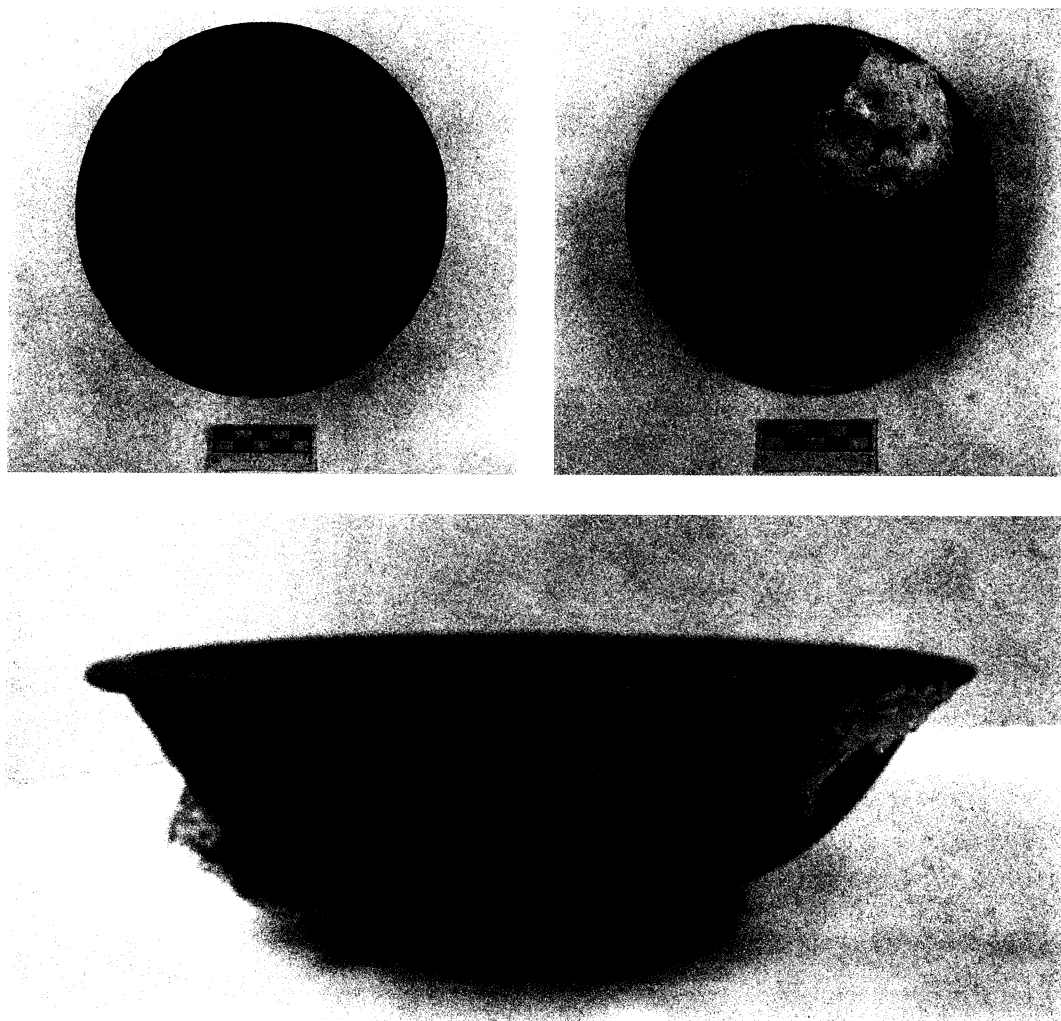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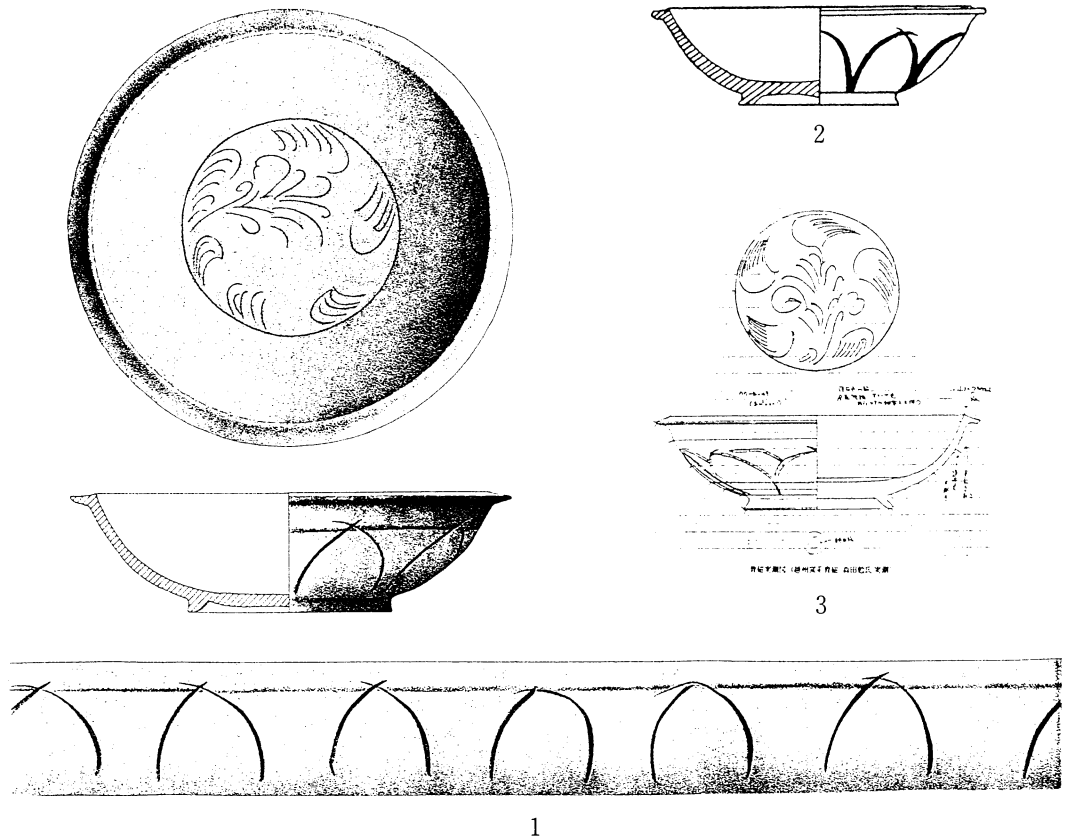
圖 13 IIIb 式洗（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期。⁽³⁸⁾ 另外，菲律賓浦端（Batuan）出土的類似作品亦被視為十世紀後遺物（圖 14-3），⁽³⁹⁾ 山本信夫在考案諸多出土實例後，認為該類作品的相對年代約在五代至北宋初。⁽⁴⁰⁾

(38) 森田勉，〈毛彫文様のある二、三の青磁について〉，頁 103，圖 2；頁 106，註 7。

(39) Wilfredo P. Ronquillo and Rita C. Tan, “Yue, Yue-Type Ware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Butuan, Philippine,” in Chuimei Ho ed.,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Congquan War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 263, pl. 2-c.

(40) 山本信夫，〈東南アジアの 9-11 世紀貿易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1（1991），頁 5，圖 3 之 11。該圖為森田勉實測，見中島恒次郎、森田レイ子編，《大宰府陶磁器研究》，頁 173。



1. IIIb式洗 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2. 中國浙江省鄞縣窯址出土 3. 菲律賓浦端(Batuan)遺址出土

圖 14

(四) IV 類

碗，1件（臺灣海峽打撈品）（圖 15）。餅形實足，外底心內凹，足壁略向外敞，器胎篩洗不純，灰色胎中夾有明顯的黑色雜質，器身施抹化妝土，施釉不到底，內底心有呈環形排列的支燒墊痕。這類成形整修粗糙、釉質較差的作品於日本九州鴻臚館遺跡等大宰府轄內出土不少，相當於過去龜井明德、森田勉等人所分類的 II 類，即所謂的越窯粗製品。不過，相對於越窯目前並未出土類似青瓷，近年田中克子等人則於鄰省福建福州懷安窯窯址發現了同類標本，證實了此類粗製青瓷應是福州懷安窯所生產。其相對年代約在唐至五代時期（圖 16）。⁽⁴¹⁾ 另外，

(41) 鄭國珍、栗建安、田中克子，〈福州懷安窯貿易陶磁研究〉，《博多研究會誌》7（1991），頁 137-196，中文另見《福建文博》2（1999），頁 11-54。



圖 15 IV 類碗殘片 (臺灣海峽打撈標本)



圖 16 中國福建省懷安窯址出土

近年的調查結果也表明懷安窯系青瓷標本不僅於福州市內遺跡經常可見，其於泰國（Ko Kho Khao）、婆羅州（Trusan Kupang）、印尼（Karawang）或越南等地亦曾出土。⁽⁴²⁾

三、考古所見越窯細線劃花裝飾—— 兼談澎湖採集細線劃花標本的定年問題

如前所述，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自澎湖採集得到的 III 類標本，即整體施滿釉、僅外底留有支燒泥痕的碗盤類殘片計 4 件，且均屬無紋飾的 a 型。另一方面，依據《越窯在澎湖》一書的文字敘述，結合圖版所示標本的外觀特徵，初步統計可歸入本文 III 類的碗盤類標本至少有 2,344 件。其中，符合本文 III 類 b 型，即帶刻劃花紋飾的標本有四百餘件，若再結合壺、罐等其他器式，則陳氏獨力採集自澎湖的總計 3,153 件標本中，有 675 件可歸入帶有紋飾的 IIIb 式。以裝飾技法而言，絕大多數屬於所謂的細線劃花。歷來對於越窯青瓷的細線劃花之年代，見解分歧，有唐至五代說、⁽⁴³⁾ 五代說、⁽⁴⁴⁾ 五代至北宋說⁽⁴⁵⁾ 和北宋說⁽⁴⁶⁾ 等幾種不同的看法。從研究史來看，主張越窯細線劃花屬唐或五代時期作品的說法，集中於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八〇年代以後則以五代至北宋說，特別是北宋說較為普遍。由於細線刻劃花裝飾的年代既和如何評估五代或北宋越窯一事息息相關，也直接影響到臺澎海域所見類似作品的斷代問題。因此，我想應有必要從研究史的角度結合新近的考古發掘成果，對此議題做些說明。

（一）遼代墓葬出土越窯細線劃花青瓷的省思

做為中國南北方交流的例證，遼墓出土越窯青瓷很早就為學界所留意，如近年於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發現的會同五年（942）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越窯青瓷，就

(42) 山本信夫，〈日本、東南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 9-10 世紀の貿易とイスラム陶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94（2002），頁 118。

(43) 長谷部樂爾，〈十世紀の中國陶磁〉，《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紀要》3（1967），頁 37，圖版 3。

(44) 陳萬里，〈越器圖錄〉（上海：中華書局，1937），頁 34-36。

(45) 馮先銘，〈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穫〉，《故宮博物院院刊》1（1981），頁 6。

(46) 朱伯謙，〈越窯〉（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中國陶瓷全集 4，1981），頁 178。

是學界耳熟能詳的實例。⁽⁴⁷⁾ 但是，相對於上引紀年墓出土的素面青瓷，裝飾細線劃花與本文論旨密切相關的非紀年佚名墓葬出土品，就未必會得到足夠的重視。

早在一九五〇年代，發掘遼寧義縣清河門四號墓（嵩德宮銅鈔墓）時，已曾見到報告者推測是「汝窯青瓷」的細線刻劃花碟。⁽⁴⁸⁾ 作品滿釉，圈足壁薄略往外卷，足內部有五處長條形墊燒痕，碟面刻劃和澎湖採集品極為類似的龜荷紋（圖 17-1）。這件並未引起學界注目的作品，無論在造型、裝燒技法、刻劃花風格或紋飾母題等各個方面，均與越窯窯址所出標本一致，所以我認為其無疑是來自南方越窯的製品。報告者李文信曾就義縣清河門墓群之二號墓蕭相公墓誌所載：「次曰慎微，崇德宮副部署」誌文，結合該墓墓主蕭相公卒葬於遼重熙十三年（1044），推定伴出之帶崇德宮銘文的四號墓年代應約在十一世紀。⁽⁴⁹⁾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有越窯龜荷紋碟的四號墓另伴出遼窯白瓷長頸瓶，而著名的內蒙遼開泰七年（1018）陳國公主暨駙馬墓也出土了造型特徵完全一致的同類長瓶，⁽⁵⁰⁾ 故可說明義縣清河門四號墓之相對年代確是在十一世紀前期。

眾所皆知，陳國公主墓也出土了越窯青瓷，除了一件底刻「官」款的纏枝花卉盤之外，亦見盤心飾對蝶紋的六花口盤（圖 18-6）。⁽⁵¹⁾ 雖然前述推測年代約在十一世紀前期的義縣清河門四號墓或陳國公主墓的越窯青瓷均採類似的細線刻劃花技法進行裝飾，然而這是否即意謂兩墓所出越窯劃花青瓷就是燒造於十一世紀前期？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越窯細線劃花龜荷紋於浙江餘姚上林湖黃鱔山、⁽⁵²⁾ 紹興上灶官山等越窯系窯址中都會發現（圖 17-2、17-3）。⁽⁵³⁾ 儘管從以往窯址調查報告書看來，裝飾有包括龜荷紋在內的細線劃花青瓷標本，均未帶紀年款識，然而馮先銘卻曾提到上林湖窯址曾採集到一件底部刻「太平戊寅」紀年銘的龜荷紋

(47) 齊曉光等，〈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頁 25，圖 53、54。

(48) 李文信，〈義縣清河門遼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8（1954），頁 194，圖 24 之 3。

(49) 同上註，頁 201-202。另外，近年今野村樹亦從墓室結構等著手將四號墓的年代定於所謂的 III 期，即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前半。參見：今野村樹，〈遼代契丹墓の研究——分布、立地、構造について〉，《考古學雜誌》87：3（2003），頁 21、23。

(50)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 53，圖 32 之 1。

(51) 同上註，頁 56，圖 33 之 1、2。

(52) 金祖明，〈浙江餘姚青瓷窯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3（1959），頁 115，圖 6 之 3。

(53) 紹興市文管會，〈紹興上灶官山越窯調查〉，《文物》10（1981），頁 44，圖 4 之 4。

盤。⁽⁵⁴⁾ 一九八一年於香港舉辦的中國古代窯址展當中確實包括一件上林湖窯址採集得到的外底陰刻「太平戊寅」(即太平興國三年〔978])、內底心細線陰刻龜荷紋的標本,⁽⁵⁵⁾ 由此可知越窯細線刻劃花紋飾於北宋初期,即十世紀七〇年代已經出現,可惜帶「太平戊寅」款龜荷紋飾標本只刊載外底圖版,故目前還難就其紋飾特徵和遼墓所出同類作品進行細緻的比較。

另一方面,近年來的考古資料卻也顯示於器內底陰刻對蝶紋的越窯青瓷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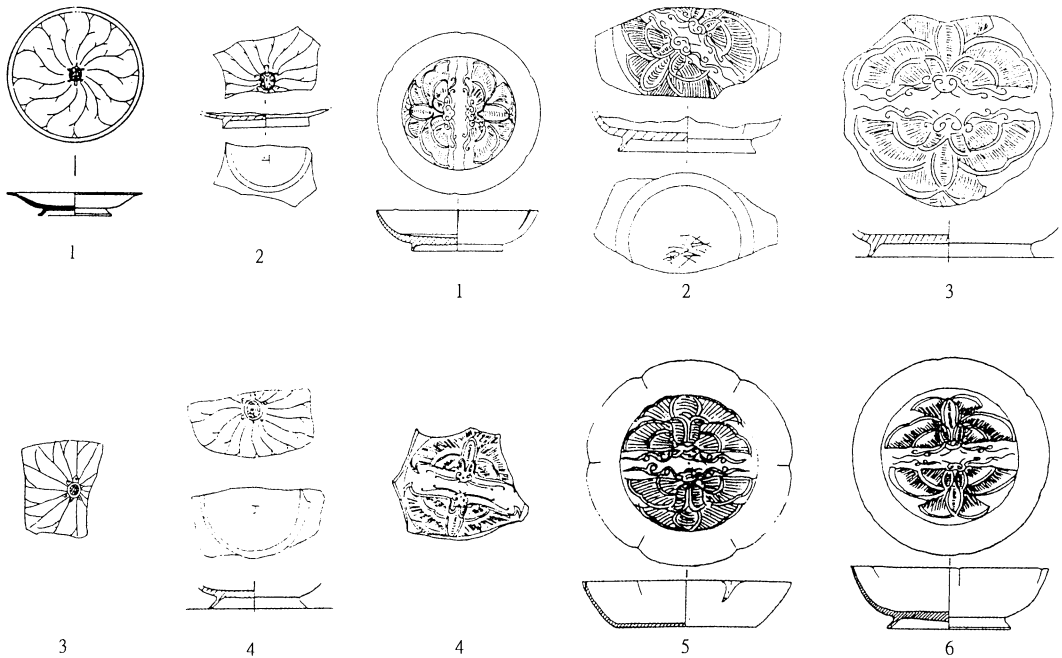


圖 17 1. 中國遼寧省義縣清河門四號墓出土
2. 中國浙江省上林湖窯址出土
3. 中國浙江省紹興上灶官山窯址出土
4. 臺灣澎湖採集品

圖 18 1.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窯址出土
2. 中國浙江省上林湖窯址出土
3. 臺灣澎湖採集品
4. 中國浙江省鄞縣窯址出土
5. 中國河北省靜志寺塔基出土「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墨書定窯白瓷盤
6. 中國內蒙古陳國公主暨駙馬墓(1018年)出土越窯青瓷盤

(54) 馮先銘,〈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穫〉,頁6。

(55) P. Hughes-Stanton and Rose Kerr, *Kiln Sites of Ancient China* (Hong Kong: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81), p. 13; p. 122, fig. 63.

中，有的還於外底刻記「太平戊寅」年款（圖 18-2）。⁽⁵⁶⁾ 從已公布的圖版和線繪圖看來，其和陳國公主墓的對蝶紋大同小異，由於對蝶紋飾又見於越窯上林湖、白洋湖、古銀錠湖、寺龍口等窯址標本（圖 18-1），⁽⁵⁷⁾ 甚至於同一窯區出土的對蝶紋樣亦不盡相同。因此，我個人實在無法參透陳國公主墓和「太平戊寅」刻銘標本所見大同小異對蝶紋飾所透露出的玄機。換言之，義縣清河門四號墓和遼開泰七年（1018）陳國公主墓所見繁密的細線劃花越窯青瓷若非傳世品，則應是越窯細線劃花技法和相同的裝飾母題幾乎一成不變地延續了約四十年。

內蒙哲里木盟奈林稿木頭營子一號壁畫墓出土的越窯青瓷，也是一群未引起注意但值得探究的作品，器形包括青瓷花口碗、折沿盆和內底飾綬帶四花紋的小碗。⁽⁵⁸⁾ 雖然發掘報告書只約略提到木頭營子一號壁畫墓的年代早於吉林哲里木盟一號遼大康六年（1080）墓，⁽⁵⁹⁾ 但我們仍可依據同墓出土的越窯青瓷花口碗和折沿盒既和洛陽後梁開平三年（909）高繼蟾墓，⁽⁶⁰⁾ 或浙江臨安後晉天福四年（939）吳越國恭穆皇后康陵⁽⁶¹⁾ 所出越窯同類作品造型基本一致，得知其相對年代約於十世紀前期。其次，由於木頭營子一號壁畫伴出的青瓷碗碗心所飾細線劃花綬帶四花紋（圖 19-1），又和浙江東陽南市塔出土的青瓷盤內底裝飾有共通之處（圖 19-2），而後者南市塔建於北宋建隆二年（961），⁽⁶²⁾ 故可推測奈林稿木頭營子一號墓有較大可能為十世紀前中期墓葬。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遼韓佚夫婦墓（韓佚，統合十五年〔997〕葬；妻王氏，統合二十九年〔1011〕合葬）也出土了一件碗心

(56)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頁 140，圖 69 之 3、彩圖 15 之 1。

(57) 同上註，頁 70，圖 34 之 11；頁 73，圖 35 之 1；頁 140，圖 68 之 4 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頁 84，圖 51。

(58) 鄭隆，〈內蒙哲里木盟奈林稿遼代壁畫墓〉，《考古學集刊》1（1981），頁 235，圖 7 之 4、5、7。另外，學界對於奈林稿木頭營子一號墓的年代，意見並不一致，如彭柯就將該墓出土的皮囊式壺列入遼代晚期前段，即興宗（1031-1055 年）間的作品；彭柯，〈蒙東、遼西地區遼墓分期與分區探討〉，收於陳克倫編，《文博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273。董新林也是從該墓伴出的皮囊式壺著手，認為墓葬年代應在聖宗、興宗階段（983-1055 年）；董新林，〈遼代墓葬形制與分期略論〉，《考古》8（2004），頁 67。楊晶則將該墓皮囊式壺的年代定於遼代穆宗（951-969 年）至景宗（969-982 年）之間；楊晶，〈略論雞冠壺〉，《考古》7（1995），頁 637。我認為該墓所出橫樑式皮囊壺屬遼代早期的器式，詳參見謝明良，〈記皮囊式壺〉，《故宮文物月刊》18:1（2000），頁 48。

(59) 陳相偉等，〈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一號遼墓發掘簡報〉，《文物》8（1973），頁 13。

(60) 朱亮等，〈洛陽後梁高繼蟾墓發掘簡報〉，頁 54，圖 3 之 5、11，彩圖 2。

(61) 張玉蘭，〈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2000），封裏圖 1；頁 22，圖 34。

(62) 貢昌，〈浙江東陽南市塔出土青瓷〉，《考古》1（1985），頁 96，圖 1 之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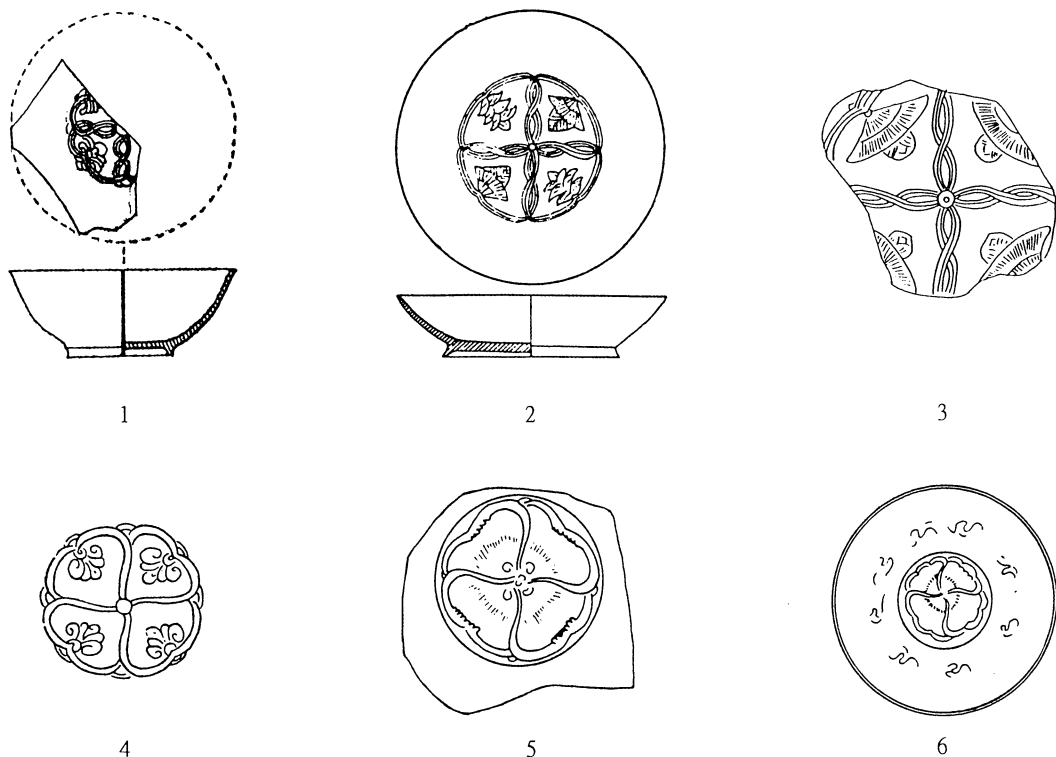


圖 19

1. 中國內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木頭營子一號墓出土
2. 中國浙江省東陽南市塔出土
3. 臺灣澎湖採集品
4. 中國北京遼代韓佚夫婦墓(997-1011年)出土
5.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窯址出土
6.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窯址出土

飾綬帶四花紋的越窯青瓷碗(圖 19-4)。(63) 而類似母題於越窯寺龍口窯址第 2 和第 3 號探溝第 3 層標本亦可見到(圖 19-5、19-6), 後者依據層位等資料判斷其年代約於北宋神宗元豐年至欽宗時期(1078-1127)。(64) 在此我想強調指出, 儘管上述諸例母題類似, 然而相對於十世紀前中期奈林稿木頭營子一號墓作品所見規整而具象的圖紋, 至越窯址十一世紀後半至十二世紀前半期標本, 已經簡化成複線四瓣花圖紋, 原本夾纏於綬帶間的四朵花也簡約成寓意不明的鋸齒狀物, 而年代在十世紀末或十一世紀初的韓佚夫婦墓所見綬帶四花紋之造型則正好介於兩者之間。這也就是說, 韓佚夫婦墓綬帶上的花朵雖已不若奈林稿木頭營子一號墓般具

(63) 黃秀純等,〈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3(1984),頁366,圖6之1、6。

(6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頁173,圖96之2;頁179,圖100之7;頁351。

象寫實，卻仍舊可識別出原型，並未失真，但原本應呈絞索狀交互纏繞成四瓣花形的綬帶，於韓佚夫婦墓則簡化成單調的雙鉤四花形邊廓。如果我的這一觀察無誤，就可以從樣式變遷的觀點來說明越窯細線劃花紋不僅沿續存在至十世紀末或十一世紀初期，並且頑強地保留了十世紀中期的裝飾作風，未有太大的改變。就此而言，前述相對年代在十一世紀前期的義縣清河門四號墓和陳國公主墓所見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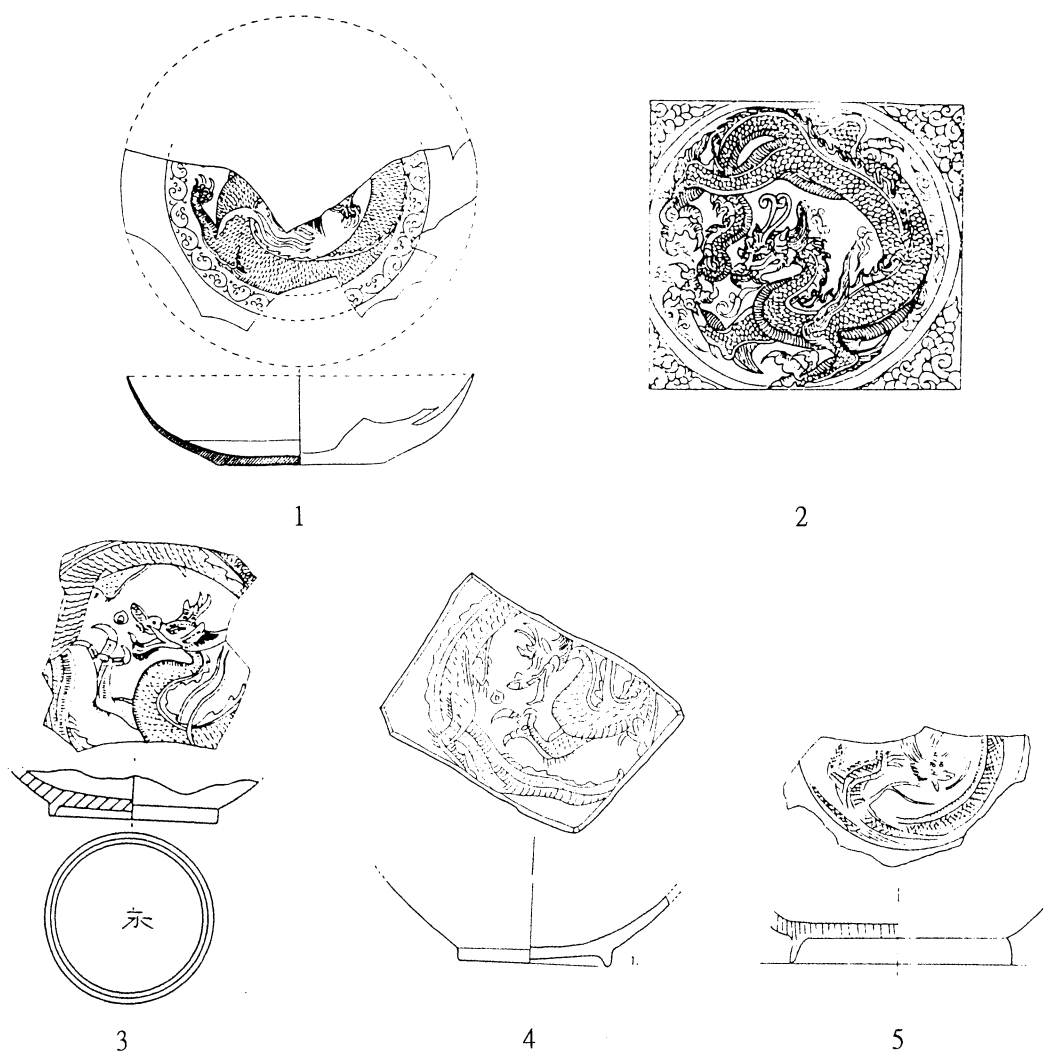


圖 20

1. 中國河南省鞏縣北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000年)出土
2. 中國河南省鞏縣北宋太宗元德李后陵(永熙陵)東列石望柱
3. 中國浙江省上林湖窯址出土
4. 日本根津美術館藏品
5. 臺灣澎湖採集品

窯青瓷，會不會也是因相同的理由致使我們無法和十世紀中期的作品進行明顯的樣式區隔？換言之，兩墓所出作品有可能並非一度傳世而後入壙的古董，至少我個人很難想像兩墓竟會不約而同地在相近時段以越窯的傳世古物來陪葬。關於這點，河南鞏縣北宋咸平三年（1000）太宗元德李后陵所伴出的同樣刻飾有細線圖紋的越窯青瓷（圖 20-1），⁽⁶⁵⁾ 也可做為此時越窯細線劃花紋的參考例證。

（二）對於幾件帶紀年銘文越窯青瓷的檢討

在討論越窯細線劃花作品的年代問題時，不得不留意到還有一群在一九五〇年代常為學者提及，而後幾近銷聲匿跡的器底刻有十世紀中期干支紀年款的作品。特別是由 Max Loehr 披露的幾件具細密劃花且帶有太平興國年間紀年銘款的越窯作品，銘款均鐫刻於器底，其包括「太平丁丑」（977 年）銘蓋盒（圖 21-1、21-2）以及「太平戊寅」（978 年）銘水盂（圖 22）。⁽⁶⁶⁾ 此外，就我所知，牛津大學亞述摩博物館（Ashmolean）收藏有「太平己卯」（979 年）銘碗，⁽⁶⁷⁾ 上海博物館⁽⁶⁸⁾ 和日本逸翁美術館⁽⁶⁹⁾ 亦各典藏一件「太平戊寅」（978 年）銘蓋盒（圖 23-1、23-2）。上述幾件作品的刻銘有一共通的特色，即字體較方，筆劃工整，刻痕銳利，同時器底支燒痕多呈泥團或花生狀，各支燒點不相接續，但間隔有序地分布排列於器底周圍，泥團質地較堅硬，脫落後支燒痕跡有的深入胎骨，而這些都和考古資料所見可靠的唐宋時期越窯青瓷標本的支燒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以近年來最為重要的兩處越窯窯址發掘資料為例，著名的上林湖窯址所見裝飾對蝶、龜荷等細線劃花的標本，器底均以墊圈支撐再置於匣鉢內燒造，器底和墊圈則以長

(65) 孫新民，〈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發掘報告〉，《華夏考古》3（1988），頁 38，圖 16 之 1。

(66) Max Loehr, "Dated Pieces of Yüeh Ware," *Far Eastern Ceramic Bulletin* 2: 6 (1950), p. 243, pl. x. fig1-4. 另外，「太平戊寅」款水盂的清楚圖版可參見：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第 12 卷·宋》（東京：小學館，1977），頁 198，圖 175、176；「太平丁丑」蓋盒，一度歸 Eugene Bernat 夫婦收藏，參見：Parke Bernat, *Important Chinese Ceramic and Works of Art, The Collection of Mr. and Mrs. Eugene Bernat* (New York: Sotheby's, 1980), fig. 39.

(67) 筆者實見。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施靜菲女士和 Ashmolean 博物館的 S. J. Vainker 女士帶領我進入庫房特別參觀。

(68) 汪慶正等編，《中國·美の名寶》（東京：日本放送協會，1991），頁 99，圖 107；蓋盒側面圖見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圖 55。

(69) 逸翁美術館，《ゆたかな日々の彩り中國陶磁》（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1992），頁 28，圖 40。



圖 21 「太平丁丑」(977 年)銘蓋盒



圖 22 「太平戊寅」(978 年)銘水盂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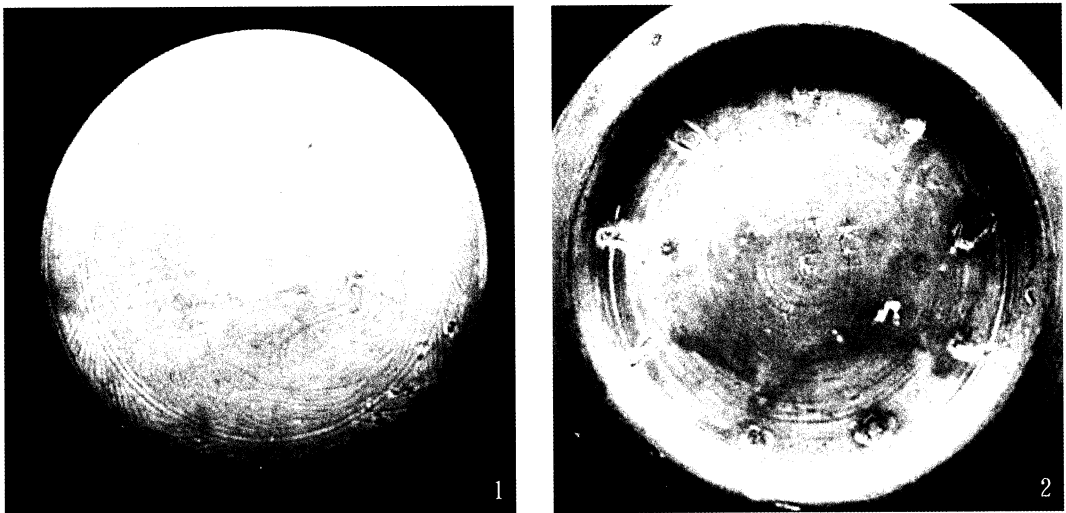


圖 23 「太平戊寅」(978 年)蓋盒 (中國上海博物館藏)

條形泥條間隔；⁽⁷⁰⁾ 而寺龍口窯址北宋早期標本也是以墊圈支撐外底，墊圈與器之間亦以泥條間隔。⁽⁷¹⁾ 結合傳世的大量遺物，可以認為類此的裝燒方式和泥條造型是五代北宋時期即本文的 III 類標本的共通特徵。不僅如此，用以間隔的泥條也極少例外的是採用含矽砂的白細泥，用指甲可以刮落，細泥外觀多呈細長條形，有時呈長團形，但無論如何均是以頭尾相接即與圈足平行的形式環繞器底，絕未見到呈泥團或花生造型且以身相接即頭尾與圈足垂直的例子。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一九九〇年代馮先銘在臺北的一次演講中也針對前引 Max Loehr 公諸於世現藏波士頓美術館的水盂提出質疑。他認為該件水盂底部以泥坨支燒的方式與越窯條狀的支具痕不同，若結合其胎釉特徵，無疑是民國初年的做製品，⁽⁷²⁾ 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另外，儘管上海博物館的陶瓷鑑識名家輩出，我仍想指出該館所典藏的底刻「太平戊寅」年款蓋盒盒面所裝飾的細線劃花雙鶴紋，雖亦採行常見於越窯青瓷上的「一整二破」佈局，然而製造者似乎對此構圖不甚熟稔，以至於筆勢既顯猶豫，雙鶴咀頸部位理應營造出的中心圓亦嫌勉強，甚至略去當中一隻鶴鳥的雙足，而這樣的情況也是北宋越窯青瓷所未曾見到的。因此，從我目前主觀的認知來看，以上幾件在銘文字體、裝燒方式等均迥異於考古發掘標本的傳世作品，有較大可能均屬近代做品，而從上述幾件蓋盒刻銘字體看來，甚至不排除可能是出自同一作坊的做製品。

(三) 澎湖採集越窯系細線劃花標本的年代問題

澎湖所見越窯系細線劃花標本(IIIb 式) 主要見於陳信雄《越窯在澎湖》專書。依據該書的記述，採集的三千餘件越窯青瓷標本當中，計有 675 件帶有紋飾，參酌同書「澎湖越窯紋飾統計表」，可知紋飾內容包括同氏所稱的「龍紋」(5 件)(圖 20-5)、「波濤紋」(6 件)、「鳥紋」(155 件)、「花卉紋飾」(64 件)、「雙蝶紋」(69

(70)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頁 102-108。

(7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頁 353-361。

(72) 我親耳聽聞的此次演講的大概內容後來以〈做古瓷出現的歷史條件與種類〉為題，刊載於《中華文物學會年刊》(馮先銘，〈做古瓷出現的歷史條件與種類〉，《中華文物學會年刊》[1992]，頁 31)，又收於馮先銘，《古陶瓷鑑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頁 23。另一方面，截至近年仍有人未加質疑地全面採信波士頓美術館和上海博物館的上述帶「太平戊寅」款作品，如陳克倫就據此做為越窯編年的依據。見陳克倫，〈宋代越窯編年的考古學考察——兼論寺龍口窯址的分期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9 (2002)，頁 235。

件) (圖 18-3)、「龜荷紋」(96 件) (圖 17-4)、「纏枝四荷紋」(42 件) (圖 19-3)、「蓮瓣紋」(114 件) (圖 24-4)，以及見於壺身、壺嘴等部位的花卉等紋飾。⁽⁷³⁾ 在進入正式的討論之前，我想指出陳信雄在試圖為澎湖採集越窯標本定年時，也提及前述北京韓佚夫婦墓 (995-1010 年) 和陳國公主暨駙馬墓 (1018 年) 兩座紀年墓出土的細線劃花越窯青瓷，但卻在未經任何考證或說明的情況之下，即先判斷兩墓所出越窯青瓷「並非製作之年」，⁽⁷⁴⁾ 並以此為前提，依據「三項證據，可以進而推論澎湖越瓷之可能年代」。⁽⁷⁵⁾

以下，我想先引述陳氏據以定年的「三項證據」，而後依序逐一檢證。陳氏的三項證據分別是：(1)河北靜志寺塔基出土的內底刻劃雙蝶紋，外底露胎處墨書「太平興國二年」(977) 紀年銘文的定窯白瓷盤 (圖 18-5)；⁽⁷⁶⁾ (2)越窯上林湖窯址採集得到的刻飾龜荷紋樣，且帶有「太平戊寅」(太平興國三年 [978]) 年款的標本；(3)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曾展出之外底鐫刻「太平丁丑」(太平興國二年 [977])，器表裝飾繁密細線劃花紋飾的青瓷蓋盒 (同圖 21)。陳氏認為：既然靜志寺塔基已出現燒造於太平興國二年的劃花雙蝶紋定窯白瓷，那麼越窯青瓷同類母題裝飾之年代就不晚於這一時期，因為前者是受到後者的影響。⁽⁷⁷⁾ 其次，「太平戊寅」款作品既見龜荷紋飾，「太平丁丑」款蓋盒亦見類似劃花技法裝飾，故包括澎湖標本在內的越窯之繁密細線劃花技法應早在太平興國二年 (977) 業已出現或流行。不僅如此，同氏進而結合澎湖所見二百餘件越窯標本器底均鐫刻「丁」字一事，主張「丁」即「丁丑」年之簡易書寫方式。⁽⁷⁸⁾ 換言之，其於澎湖採集得到三千餘片越窯青瓷標本的絕對年代是在太平丁丑年 (太平興國二年 [977])，即吳越忠懿王錢俶進獻其領地降宋的前一年。⁽⁷⁹⁾

(73) 陳信雄，《越窯在澎湖》，頁 169。但是該重要發現也有一些讓人感到困惑不解之處。比如說，自該書出版以迄今日的十年間，陳氏於報紙、期刊、專書甚至研討會等各種場合，屢次發表與此一發現相關的議論，但是其所呈現引用的圖片，卻都只是重複同氏早已發表過的少數幾件標本。另外，對於採集地點秘而不宣，不符學術慣例。

(74) 同上註，頁 127。

(75) 同上註，頁 127。

(76)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8 (1972)，圖版柒之 3。清楚圖版可參見：馮先銘，《定窯》(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中國陶瓷全集 9，1981)，圖 49。

(77) 陳信雄，《越窯在澎湖》，頁 129。

(78) 同上註，頁 131。

(79) 同上註，頁 165。



圖 24

1.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北宋雍熙四年(987)銘四繫壺
2. 中國浙江省黃岩寺塔出土咸平元年(998)墨書鏤空薰
3. 中國江蘇省虎丘塔雲岩寺(961年)出土
4.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越窯窯址出土
5. 臺灣澎湖採集品

然而，我想說明的是：(1)認為河北靜志寺塔基出土，帶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墨書紀年之定窯白瓷雙蝶紋劃花裝飾是受到越窯同類技法的影響，其實是馮先銘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就已提出的看法。⁽⁸⁰⁾但問題是，這類呈頭部相向展翅的所謂對蝶紋，至遲在唐代元和七年(812)惠昭太子陵出土的石蓋盒之盒面上已可見到(圖25)，⁽⁸¹⁾看來定窯和越窯的對蝶紋飾顯然均是承襲自唐代工藝品，特別可能是金銀器上的圖紋。因此馮氏所謂定窯劃花受到越窯影響的說法，有修正的必要；(2)帶「太平戊寅」年款且裝飾龜荷紋細線劃花的標本，至多只能說明該類紋樣年代可上溯太平戊寅年(978年)，卻不能據此推演其他同類紋樣標本的年代上下限。這也就是說，在未能依據風格變遷而擬定出作品的上下限之前，個別紀年作品很難做為訂定類似紋樣標本精密年代時的絕對依據；(3)陳氏所引「太平丁卯」紀年蓋盒即前述(同圖21)Max Loehr公諸於世的那件本文認為的近代



圖 25 中國陝西省唐代惠昭太子陵(812年)出土

- (80) 馮先銘，〈我國陶瓷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從中國出土文物展覽陶瓷展品談起〉，《文物》7(1973)，頁25。另外，馮氏的此一看法於近年又為江松氏所繼承和發揚，參見：江松，〈再論越窯對定窯的影響〉，《上海博物館集刊》8(2000)，頁302-317。江文同時認為陳國公主墓出土的越窯對蝶紋盤「應為五代末至宋初物」，但未提示任何證據；同上註，頁303。附帶一提，江文對於作品的窯口判斷並不正確，如將龍泉窯和耀州窯製品視為越窯青瓷，應予修正；同上註，頁304，圖3。
- (8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唐惠昭太子陵發掘報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頁5，圖4。另外，關於對蝶紋在工藝品上的表現情況，可參見：謝明良，〈略談對蝶紋〉，《故宮文物月刊》22:8(2004)，頁24-39。

贗品，因此在未能明確交代作品所見種種疑點之前，不足為據，更不宜將之做為澎湖三千餘件越窯燒製於太平丁卯（977年），即吳越亡國之前一年的關鍵證據。

四、有關北宋越窯和「永」款越器的幾個問題

從作品的外觀特徵參酌可判明相對年代遺址出土的類似標本，同時結合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將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區分為 I、II、III 等三類。I 類和 II 類標本較常見於國外九至十世紀遺址，III 類則集中見於十世紀中期遺跡或墓葬。

由於裝燒技法的改變往往促使作品外觀發生變化，而陶工為追求作品的某種造型或裝飾效果，同樣也會勉力考案窯具等裝燒道具並予以改進，而此一相輔相成，彼此不斷要求、相互改進的進程有時也成了時代的烙印，具有編年、分期時的參考價值。因此，以下我想參考近年越窯寺龍口窯址的發掘成果及其頗得要領的簡要歸納，⁽⁸²⁾ 對臺灣海域越窯系青瓷的裝燒工藝和造型以及年代關係做些必要的說明。即足端以外施滿釉的 I 類，釉色精純，應是於匣鉢內單件燒成，但因作品與匣鉢之間間隔用泥條係置於圈足上，故圈足著地處較寬，呈環形足。其次，足端之外內底亦見疊燒泥痕的 II 類標本，姑不論其是否使用匣鉢或只是置於支具上明火裸燒？其均是以多件摺疊的方式燒成，底亦置環形足。至於整體施滿釉，僅外底心留有支燒泥痕的 III 類標本也是置於匣鉢內燒成。但因是以墊圈支撐器物外底，故作品底部相對加厚，同時又由於作品底足於燒造時不必承擔整器的重量，故器物的足端變窄，甚至以黏接的方式加裝足牆細窄且向外撇的高圈足，使得圈足外觀更具金銀器的造型特徵。當然，本文和寺龍口越窯報告書所採行的分類並不相同，但若僅就裝燒技法而言，本文的 I 和 II 類大致相當於寺龍口窯的唐和五代期，III 類則相當於該窯北宋早期以迄南宋期。此一年代觀也和本文對於三類作品的年代比定有相符之處。無論如何，I 類和 II 類標本可說是相近時代並存的兩類檔次不同的陶瓷器，年代最晚的 III 類則是於 I 類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昇、精

(8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頁 353-361。但應指出的是，窯址報告書同樣也是在未加說明的情形下，就全面採信陳國公主等遼代紀年墓出土越窯劃花青瓷之年代相當於墓主的卒葬年，並以此做為窯址標本分期的參考。

鍊而成的。

這樣看來，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顯然存在有以匣鉢單件裝燒的高檔品和採多件摺疊支燒的次級品等兩種檔次不同的製品。不僅如此，其年代跨幅也不小，既見九至十世紀前期晚唐五代標本，也包括十世紀中期前後五代時期，甚至晚迄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初的北宋早期作品在內，後者均見於陳信雄澎湖採集品，屬於本文的 IIIb 式。如前所述，經由越窯系青瓷綬帶四花圖紋的比較，北京韓佚夫婦墓（997-1011 年）出土的越窯細線劃紋青瓷的年代應相當於墓主的卒葬年（同圖 19-4）。設若此一推論無誤，則韓佚墓伴出之越窯青瓷注碗內底所見一對頭尾相接的劃花鸚鵡紋（圖 26-2），⁽⁸³⁾ 既和澎湖採集品一致（圖 26-3），⁽⁸⁴⁾ 故不排除後者的年代也應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就此而言，一九七〇年代江蘇鎮江市何家門所謂五代墓出土越窯鸚鵡紋碗的年代其實也應修正訂在北宋時期（圖 26-1）。⁽⁸⁵⁾ 有趣的是，鎮江市何家門墓和韓佚夫婦墓不僅均出土了鸚鵡大碗，同時也都出土造型一致的注壺（圖 27），結合碗和壺的尺寸，可知兩墓作品均屬將注壺置於溫碗中配套使用的酒器。值得一提的是，韓佚夫婦墓注碗除底心的鸚鵡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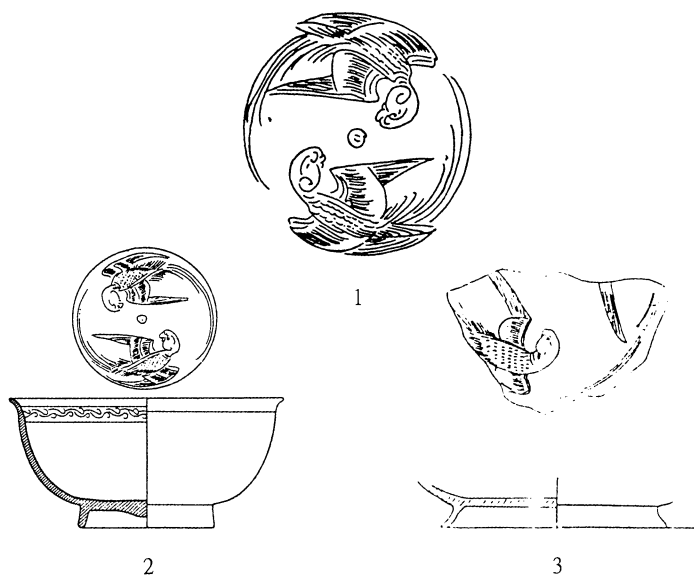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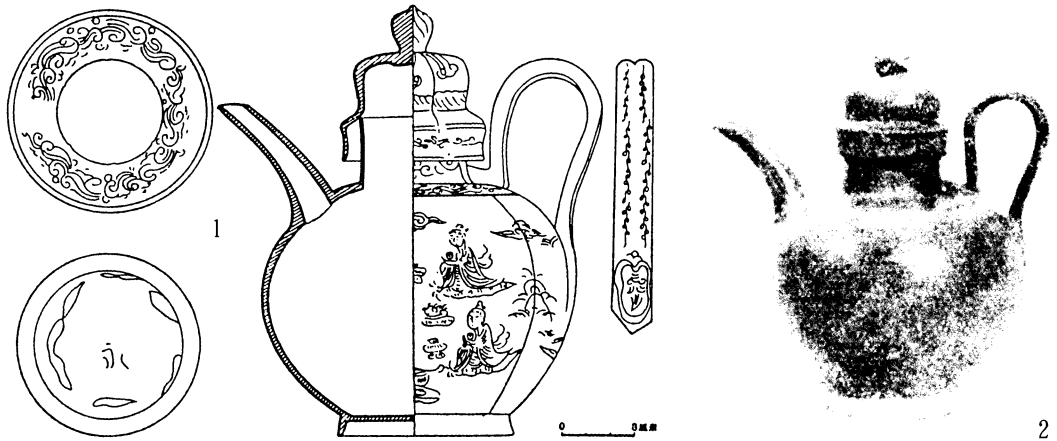
圖 26

1. 中國江蘇省鎮江北宋墓出土
2. 中國北京遼代韓佚夫婦墓
（997-1011 年）出土
3. 臺灣澎湖採集品

(83) 黃秀純等，〈遼韓佚墓發掘報告〉，頁 366，圖 6 之 6。

(84) 陳信雄，〈越窯在澎湖〉，彩圖 42。

(85) 劉和惠等，〈鎮江句容出土的幾件五代、北宋瓷器〉，《文物》10（1977），頁 90，圖 3。



1. 中國北京遼代韓佚夫婦墓(997-1011年)出土

2. 中國江蘇省鎮江北宋墓出土

圖 27

外，口沿下方另飾弦紋二道，弦紋之間刻飾簡化的唐草紋，而類似的唐草紋邊飾則又見於英國大維德爵士 (Sir. Percival David)⁽⁸⁶⁾ 和某私人收藏的越窯青瓷劃花雙鳳紋盤 (圖 28-1、28-2)。⁽⁸⁷⁾ 兩件作品均屬本文的 III2 式，即除了外底支燒泥痕之外，整體施滿釉，同時又在作品外壁浮雕仰蓮瓣，並於外底心陰刻「永」字款，而「永」款越器也見於前述韓佚夫婦墓伴出的人物紋注壺 (圖 27)。就我個人所知，現存的帶有明確紀年，且浮雕蓮瓣的越窯作品，依年代序計有：江蘇蘇州市北宋建隆二年 (961) 建成的虎丘塔雲岩寺的托碗 (圖 24-3)、⁽⁸⁸⁾ 寺龍口越窯窯址的帶「太平戊寅」(978 年) 銘盤底殘片 (圖 24-4)、⁽⁸⁹⁾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北宋雍熙四年 (987) 刻銘四繫壺 (圖 24-1)，⁽⁹⁰⁾ 以及浙江黃岩寺塔出土的帶咸平元年 (998) 墨書紀年的鏤孔薰 (圖 24-2)。⁽⁹¹⁾ 其時代自西元九六一年迄九九八年，

(86) R.L. Hobson, *A 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 (London: the Stourton Press, 1934), p. 39.

(87) 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考 (一)〉，《陶器講座》2 (1935)，頁 18，圖 5。

(88) 錢鏞等，〈蘇州虎丘雲岩寺塔發現文物內容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1 (1957)，頁 44，圖 26；南京博物院等編，《江蘇省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頁 176。

(8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頁 368，圖 180 之 3。

(90) 弓場紀知，〈北宋初期の紀年銘をもつ越州窯青磁をめぐって〉，《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1 (1995)，頁 137，圖 1。

(91) 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 198。



圖 28 英國倫敦大學大維德基金會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收藏「永」字款鳳紋盤

而就蓮瓣的外觀特徵而言，相對於雲岩寺（961 年）托碗的蓮瓣形式，大維德碗呈寬扁造型的蓮瓣紋則要更接近出光美術館（987 年）和黃岩寺塔（998 年）紀年作品的蓮瓣紋飾。然而，儘管我個人深信以樣式論的角度來考察越窯紋飾的變遷，是今後解決越窯細線刻劃花作品定年、分期的有效途徑，可惜如上所示，本文仍舊無法有力地說明越窯蓮瓣紋上的細微差異確實肇因於時代因素，進而訂定出具有此一樣式特徵之蓮瓣紋的年代上下限。

雖然如此，「永」款越器仍提供一些值得留意的線索。自一九三〇年代陳萬里《越器圖錄》揭載的上林湖採集的「永」款作品以來，⁽⁹²⁾ 日本根津美術館藏上林湖窯址採集品或近年上林湖、⁽⁹³⁾ 寺龍口窯址發掘品亦見「永」款標本（圖 20-3、20-4、29-1）。⁽⁹⁴⁾ 結合前述英國舊藏品（同圖 28）或韓佚夫婦墓（同圖 27-1）出土品，可知該類作品一般釉色精純，有素面無紋和裝飾細線劃花等兩類，後者刻飾圖紋內容不一而足，計有蓮瓣、波濤、龍、鳳、鸚鵡和人物紋，刻工細緻講究，在可確認的總計十餘件作品中，計有五件裝飾龍紋或鳳紋，而龍紋的造型特徵則又和

(92) 陳萬里，《越器圖錄》，圖 40。

(93) 根津美術館編，《唐磁》（東京：根津美術館，1988），頁 64，圖 25；頁 113，圖 1；以及頁 109，圖 87 之 25 的說明。

(94)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頁 210，圖 98 之 8；頁 211，圖 98 之 1、2、3、4、6、7；頁 207，「附錄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頁 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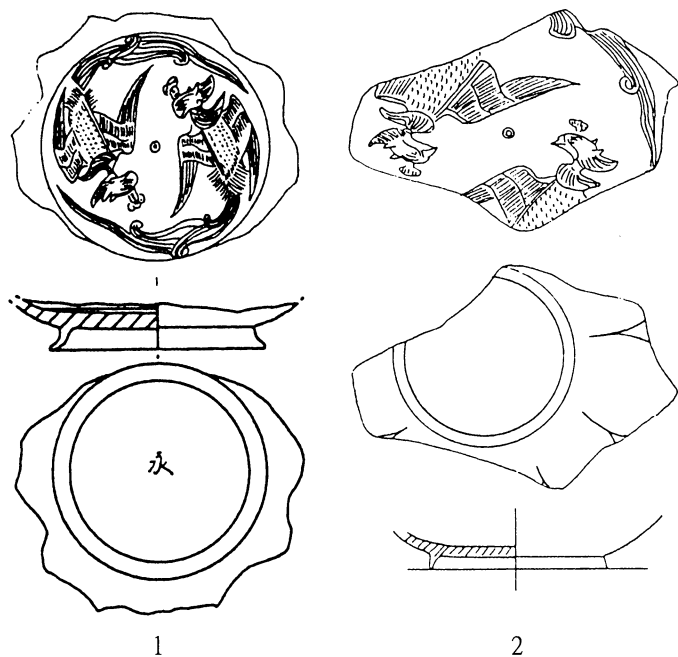


圖 29

1. 中國浙江省上林湖窯址出土
2. 臺灣澎湖採集品

河南鞏縣宋陵石雕上的龍紋有共通之處（圖 20-1、20-2、20-3、20-4）。⁽⁹⁵⁾

眾所周知，分布於河南鞏縣西村、芝田、孝義和回郭鎮的北宋帝陵，是北宋除了徽宗趙佶、欽宗趙恒被金兵俘虜客死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縣）之外，其餘七個帝王以及趙匡胤父趙弘殷所謂「七帝八陵」皆葬於此，再加上附葬於塋區的后妃、皇族或功臣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陵墓群，而所有陵墓，包括前引出土越窯青瓷的太宗元德李后的永熙陵在內，均以「永」字起頭命名，甚至於金人將崩於異鄉的徽宗梓宮送還南宋王朝葬於會稽上亭鄉，陵名亦曰「永佑」，結合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之父趙弘殷原稱「安陵」，至真宗時亦更名爲「永安陵」一事，⁽⁹⁶⁾ 不難推知「永」字在宋代皇室中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就宋代陶瓷史事而言，就在吳越錢氏降宋的太平戊寅年（978 年）之後不久的太平興國七年（982），宋太宗即派遣殿前承旨趙仁濟赴越州監理瓷窯務，⁽⁹⁷⁾ 愛宕松男認爲，所謂「越州

(95) 張廣立，〈宋陵石雕紋飾與《營造法式》的「石作制度」〉，收於中國考古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頁 263，圖 9；頁 265，圖 10 等。

(9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宋皇陵》（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頁 6-8、10。

(97) 宋末元初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下）》所記百衲琴銘文曰：「李公略收雲咸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太平興國七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越州瓷窯務趙仁濟（今傳《雲

「瓷窯務」只是職司瓷器稅的稅務機關，不能據此做為判定越州官窯存在的依據。⁽⁹⁸⁾而宋初以供奉官、殿直、承旨為三班使臣，隸屬兵部宣徽院；從三班使臣的初任官一般是職掌商稅務，專賣場務之監當官，⁽⁹⁹⁾可以推測派赴監越州瓷務的殿前承旨極可能具商稅務使的職權。但是殿前承旨雖僅為低階武官，卻是天子的心腹耳目，掌握行政實權，並扮演郎黨的功能，監督地方中央政策的施行，是確立宋代中央極權和獨裁體制的一大支柱。⁽¹⁰⁰⁾看來，趙仁濟除了可能被賦予瓷窯商稅史的職掌之外，或許還兼具視察瓷窯生產、規範陶瓷造型紋飾等窯務事宜，而上林湖越窯址發現的與「太平戊寅」款陶瓷作風一致且底刻「官」、「官樣」字銘的標本（圖 30），⁽¹⁰¹⁾應可視為是宋初朝廷「制樣需索」⁽¹⁰²⁾的具體例證。事實上，宋代朝廷也曾頒令有司於器皿上刻字銘，以為識別之用。⁽¹⁰³⁾就此而言，我認為「永」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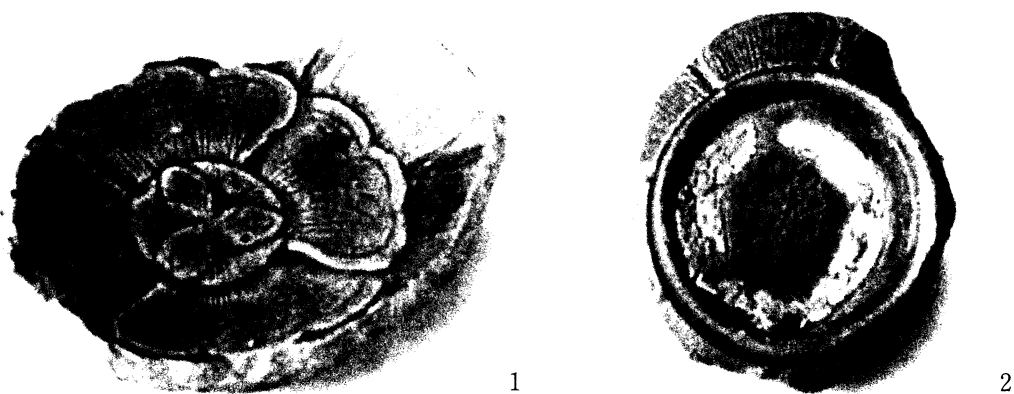


圖 30 中國浙江省上林湖窯址出土「官樣」銘殘片

煙過眼錄》記為「監杭州瓷窯務」，但《說郛》本周密《志雅堂雜抄》仍記「越州」，再補修進入，吳越國王宮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東京：便利堂，1950），頁 146-147；周密，《雲煙過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98) 愛宕松男，〈宋代、陶瓷器產業の成立とその發展（上）〉，《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24（1974），頁 35-36。
- (99) 梅原郁，〈宋代の武階〉，《東方學報》56（1984），頁 227。
- (100) 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宋朝武班官僚研究その（一）〉，收於氏著，《宋代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宋代史研究會，1983），頁 59。
- (101)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頁 51，圖 23 之 1、2；頁 93，圖 49 之 7、8，彩版 3 之 3、11 之 3。
- (102) 莊季裕，《雞肋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處州龍泉縣……又出青瓷，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廷制樣需索，益加工巧。」
- (10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篇》（臺北：世界書局，1961），卷七五：「乙丑詔大祀酌酒銀罐器止用常御者，非朕恭潔之意，其令有司造十五枚，付光祿寺別貯，仍刻字識之，勿他用。」

越器所見龍、鳳等紋飾極有可能就是由官方所規範的所謂官樣圖紋。⁽¹⁰⁴⁾不僅如此，南宋熊克著《中興小記》援引同朝朱勝非《閒居錄》所載：「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¹⁰⁵⁾可以推測越窯所見對蝶紋可能亦為官樣圖紋之一，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致使對蝶紋如同龍鳳紋般自宋初以來保守地延續近半世紀，在樣式上沒有明顯的改變。

南宋胡仔《漁隱叢話》記載太宗於太平興國二年（977）遣使造建安北苑茶，「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¹⁰⁶⁾但是龍鳳紋入宋以後地位大為提昇，且為皇室所壟斷的原因何在？關於這點，北宋王洙等奉敕撰的《地理新書》透露了與此相關的珍貴訊息。該書〈五姓所屬篇〉記述了所謂「五音姓利」，即將人的姓氏區分成宮、商、角、徵、羽等五音，再分別對應到陰陽五行的土、金、木、火、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帝王趙姓，是屬於角音，而「東方木、其氣生，其音角，其虫蒼龍」〈五行定位篇〉，⁽¹⁰⁷⁾這就明確地說明了龍是趙姓皇室的守護神，也因此我們才能理解諸如龍泉窯也一度為避諱龍字而改名為劍川縣，⁽¹⁰⁸⁾並於宣和七年（1125）詔令罷減「中山府瓷中樣矮足裏撥盤龍湯盞一十隻」⁽¹⁰⁹⁾命定窯減免燒製龍紋器皿。眾所周知，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說：「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同時代葉真《坦齋筆衡》也說：「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講的都是定窯因覆燒致使碗盤口沿需留下無釉的澀圈，從而遭受到北宋宮廷以汝窯來汰換的命運。也因此徽宗朝頒令罷減定窯燒造龍紋器皿應該是和內廷對於汝窯青瓷的興趣已凌駕於定窯白瓷之上的趣味

(104) 就我個人所知，「永」款陶瓷初見於唐代，所知兩件作品均於器底墨書「永」字，且都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其中一件邢窯白瓷長頸瓶，圖見長谷部樂爾等編，《中國陶磁百選》（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2），圖 22；另一件是唐代白釉燈臺，圖見國家文物局圖錄編輯委員會，《國寶——中國歷史文物精華展》（香港：香港藝術館，1997），頁 244-245。後者出土於河南陝縣劉家渠墓，俞偉超，〈一九五六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唐墓葬發掘簡報〉，《考古通訊》4（1957），頁 9-19。兩件作品胎釉精純、造型端正，很可能是同墓出土的來自同一產區的作品，但此還有待證實。

(105) 熊克著、顧吉辰等點校，《中興小記》，卷 5（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頁 62。

(106) 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全書》集部四一九，詩文評類，年代不詳），頁 453。

(107) 王洙，《地理新書》（臺北：集文書局，1985；金明昌抄本），頁 46。另外，最早指出這點的人可能是宿白，參見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頁 86。另可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59。

(108) 浙江省地名委員會，《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 592-593，「龍泉縣」條。

(109) 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崇儒七之六〇。

轉換有關。⁽¹¹⁰⁾ 無論如何，在北宋內廷所消費的眾多窯口的陶瓷當中不僅經常裝飾龍紋，有的甚至帶有「龍」字款，如小山富士夫採集自澗磁村定窯窯址的標本當中就包括裏飾龍紋，圈足內釉下陰刻「龍」款的作品；⁽¹¹¹⁾ 陝西耀州窯窯址宋代堆積層（中期）亦見「龍」款標本，⁽¹¹²⁾ 而依據《宋史·地理志》或宋人王存《元豐九域志》：「耀州土貢瓷器五十事」的記載可知，⁽¹¹³⁾ 耀州窯青瓷也是北宋內廷所消費的陶瓷之一。

如前所述，宋太宗趙光義妃，真宗趙恒生母元德李后陵（1000年）出土有刻飾龍紋的越窯青瓷盤（圖 20-1），尤可注意的是，其同時伴出了三十餘件多數裝飾有鳳紋的定窯白瓷，後者當中又有半數底刻「官」款。這樣的情形顯然並非偶然，幾乎是具體而微地道出：隨著龍在北宋成了天子的象徵，鳳也相應地成了帝后的圖騰。由於太宗元德李后陵已遭盜掘，因此無從估計原本是否存在有「永」款越器，反倒是工部尚書韓休夫婦墓（997-1011年）出土了越窯「永」款青瓷人物紋注壺。後者不僅再次表明「永」款越器的相對年代，也說明了宋代官樣陶瓷亦可流通的事實。可惜目前已難得知官樣越器是否像稍後的汝窯般「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¹¹⁴⁾ 還是朝廷拍賣「瓷器庫」的存貨？⁽¹¹⁵⁾ 或許，於市肆即可輕易購得亦未可知。

-
- (110) 陳萬里曾經依據上引文獻記載結合徐兢成書於宣和五年（1123）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當中已經提及「汝州新窯器」，推測汝窯燒製貢瓷的時間約在哲宗元佑（1086）到徽宗崇寧五年（1106）之間。雖然陳氏的臆測容或有修正的空間，但徽宗內廷曾經使用汝窯青瓷一事則無庸置疑。見陳萬里，〈汝窯的我見〉，《文物參考資料》2（1951），頁 48。另外，近年伊藤郁太郎有一個饒富趣味的推測，認為「汝州新窯器」即今汝州市內的「張公巷窯」，後者亦即「北宋官窯」。參見伊藤郁太郎，〈北宋官窯探訪〉，《陶說》620（2004），頁 71。但我認為，「汝州新窯器」是否即「張公巷窯」？這是一回事；而「張公巷窯」是否就是北宋官窯？則又是另一回事。其實，徐兢「汝州新窯器」的稱謂本身，即已顯示其非北宋官窯。
- (111) 關口廣次，〈小山富士夫先生採集の定窯窯址陶磁片について〉，收於根津美術館編，《定窯白磁》（東京：根津美術館，1983），頁 95；頁 101，圖 18-5-6；頁 19，圖 5 之 6。
- (11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陝西銅川耀州窯》（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頁 25，圖版拾貳之 6。
- (113) 陳萬里於 1950 年代已依據上引文獻記載指出耀州窯貢瓷器。參考陳萬里，〈我對耀瓷的初步認識〉，《文物參考資料》4（1955），頁 72。
- (114) 周輝，《清波雜誌》（上海：上海書店，1984）：「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
- (115)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三七，「瓷器庫」：「瓷器庫，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詔瓷器庫除揀封植供進外，餘者令本庫將樣赴三司行人估價出賣」。

無論如何，設若「永」款越器屬北宋時期作品，那麼該類器上所裝飾的龍、鳳、鸚鵡、對蝶、人物、波濤或於外壁飾蓮瓣內底戳印蓮子等圖紋，就可提供澎湖所見類似圖紋定年排比時的重要參考。依據這樣的觀察角度，則澎湖所採集的細線劃花龍紋、雙鳳紋或外壁浮雕蓮瓣內底飾蓮子等一群本文所謂的 III b 式作品當中之大多數標本的相對年代也約於北宋時期。但應一提的是，相對於目前可確認的「永」款越器上的龍紋呈二角五爪造型（圖 20-3、20-4），澎湖所採集的無款標本龍頭似無二角（圖 20-5），這不由得會讓人想起過去宮崎市定所指出，比起五爪，宋代天子似乎更在意龍頭上的雙角。⁽¹¹⁶⁾ 會不會是這個原因使得主要提供皇室消費的「永」款越器上的龍紋，和用來外銷的作品有所區隔？但這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證實。

總結以上敘述，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的年代跨幅較大，包括晚唐以迄北宋等各時期作品。其次，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唐宋時期燒造所謂越窯類型的青瓷窯，除了著名的慈溪市上林湖、鄞縣東錢湖等分布於杭州灣及其鄰近地區的窯群，即狹義的越窯之外，於甌江流域溫州甌窯、金華地區婺州窯，甚至台州地區臨海、黃岩等地窯址都可發現類似作風的青瓷標本，從而形成一個體系龐大、廣義的越窯瓷系。⁽¹¹⁷⁾ 而就臺灣海域越窯系作品的窯口而言，除了上林湖窯區標本之外，個別作品有的和婺州地區象塘窯作風較為接近，⁽¹¹⁸⁾ 部份作品則應是明州附近鄞縣窯所燒製（圖 14-1）。⁽¹¹⁹⁾ 臺灣海峽打撈出的鄞縣窯蓮瓣紋洗則又和菲律賓浦端（Butuan）出土作品完全一致（圖 14-3），⁽¹²⁰⁾ 屬本文 IIIb 式細線劃花類型。應予一提的是，澎湖採集的越窯系 IIIb 式標本當中，除了細線劃花類型之外，亦

(116) 宮崎市定，〈二角五爪龍について〉，收於石田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編，《石田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東京：東洋文庫，1965），頁 472。

(117) 所謂越窯系的現狀及其問題點，可參見任世龍，〈論「越窯」和「越窯體系」〉，收於南京文化院、東南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4 年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博物院，東南文化增刊 1 號，1994），頁 58-64；龜井明德，〈越州窯と龍泉窯——轉換期の青瓷窯〉，收於東洋陶磁學會編，《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狀》（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 58-63。

(118) 朱伯謙，〈浙江東陽象塘窯址調查記〉，圖版陸之 4、9。

(119) 李輝柄，〈調查浙江鄞縣窯址的收穫〉，頁 32，圖 5；頁 33，圖 7 等。

(120) Wilfredo P. Ronquillo and Rita Tan, "Yue, Yue-Type Ware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Butuan, Philippine," p. 263, pl. 2-c, 以及山本信夫，〈東南アジアの 9-11 世紀貿易陶磁器〉，頁 5，圖 3-11。

見一類以粗線斜刻輪廓及簡單花紋的製品（圖 31-1、31-2），⁽¹²¹⁾ 該類標本以往所見數量不多，但曾出土於日本鴻臚館⁽¹²²⁾ 和前述菲律賓浦端（Butuan）遺址，⁽¹²³⁾ 近年印尼勿里洞島（Belitung Island）附近沈船（Intan Wreck）除打撈出越窯細線劃花青瓷，同時也伴出不少這類粗線劃花青瓷，⁽¹²⁴⁾ 特別是從菲律賓私人收藏傳稱出土自浦端遺址的此類粗線劃花青瓷，可以復原澎湖標本的整體型態，亦即包括了刻飾花鳥紋的注子（圖 32）。據說，中國浙江省的學者認為日本出土的這類標本是同省溫州窯製品。⁽¹²⁵⁾ 果真如此，則澎湖越窯系青瓷標本當中，其實還包括少數所謂甌窯系的製品在內，但此亦有待今後的資料來證實。

如果依據現今的考古發掘成果和文獻記載，結合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標本的採集地點，雖然可以推測遺留在澎湖中屯等地遺址的越窯系青瓷，應該不會是當地的消費品，可惜我們仍缺乏足夠的證據得以判斷越窯系標本到底是船隻海難的偶然遺留？抑或是澎湖早在晚唐時期已成為中國陶瓷外銷時的中途停泊地？無論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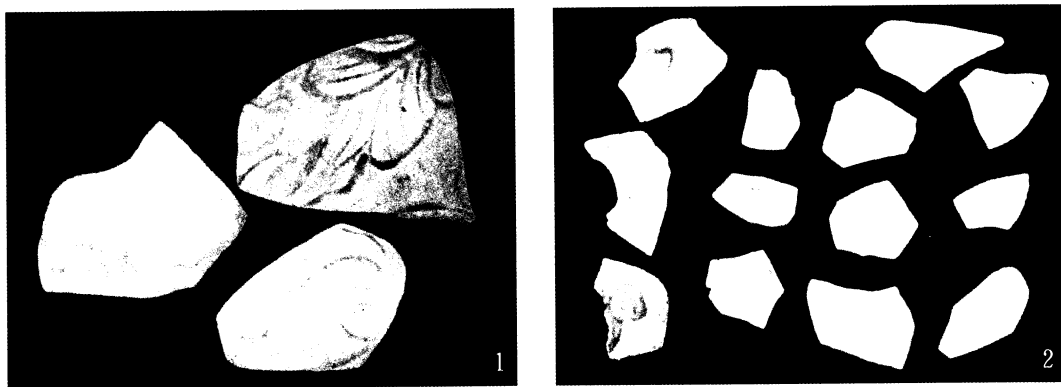


圖 31 1. 臺灣澎湖採集品
2. 臺灣澎湖採集品

(121) 陳信雄，《越窯在澎湖》，頁 46，彩圖 62。

(122) 山本信夫，〈北宋期越州窯系青磁の検討〉，頁 196，圖 9。

(123) Wilfredo P. Ronquillo & Rita Tan, "Yue, Yue-Type Ware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Butuan, Philippine," p. 264, pl. 3-A, B.

(124) 作品現藏德國，筆者實見。另可參見：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Oxford, England: Archaeo Press, 2002,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p. 108.

(125) 山本信夫，〈北宋期越州窯系青磁の検討〉，頁 195。



圖 32 傳菲律賓浦端(Butuan)遺址出土

者，從標本所屬年代跨幅看來，其在澎湖可能並非一次性的遺留。當然，此一假設必須先排除許多沈船都可見到的其同時裝載有不同時代的陶瓷器皿之現象。可惜目前已難檢證。相對的，設若陳信雄所採集標本地點不在中屯及其周邊地區，則可證明沈船不止一艘。目前可確認的是，遺留在澎湖的越窯系青瓷標本之年代，從晚唐九世紀後期持續至北宋十世紀或十一世紀初期，而以北宋初期的標本數量最多。從東北亞日本、韓國或東南亞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印度甚至中東地區伊朗、伊拉克等地都曾發現與臺灣海域所見越窯系青瓷極為相近的標本，可以再次說明中國早期外銷瓷的一個特色，即做為一種強勢的商品，生產者或瓷器商販並未充分顧及消費地人們的品味好尚，致使各地遺址出土中國陶瓷種類大同小異，這也提示我們，並無必要依據澎湖越窯系標本的器式種類來強行釐測其原本所擬輸往的國度。唯一可以確認的是，臺灣海峽澎湖水道打撈品是屬於南下貿易船隻遭受海難的遺留。

定稿日期：2005.3.2

引用書目

九州歴史資料館

- 1980 《大宰府史跡・昭和 54 年度發掘調査概報》。福岡：九州歴史資料館。
 1981 《大宰府史跡・昭和 56 年度發掘調査概報》。福岡：九州歴史資料館。
 1986 《大宰府史跡・昭和 60 年度發掘調査概報》。福岡：九州歴史資料館。

三上次男

- 1977 〈イラン發見の長沙銅官窯瓷と越州窯青磁〉，《東洋陶磁》4: 5-34。

土橋理子

- 1993 〈日本出土の古代中國陶磁〉，收於櫃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奈良、平安の中國陶磁》，頁 211-249。京都：臨川書店。
 1995 〈初期貿易陶磁器〉，收於中世土器研究會編，《概說中世の土器、陶磁器》，頁 457-484。京都：眞陽社。

大山崎町教育委員會

- 1984 《大山崎町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集》4。京都：大山崎町教育委員會。

小山富士夫

- 1935 〈支那青磁考（一）〉，《陶器講座》2: 1-54。

小林太市郎

- 1950 《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東京：便利堂。

山本信夫

- 1991 〈東南アジアの 9-11 世紀貿易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1: 1-18。
 1995 〈北宋期越州窯系青磁の検討〉，收於中島恒次郎、森田レイ子編，《大宰府陶磁器研究——森田勉氏追悼論文集》，頁 181-197。福岡：森田勉氏遺稿集・追悼集刊行會。
 1999 〈大宰府出土施釉陶器の編年について〉，《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82: 123-202。
 2002 〈日本、東南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 9-10 世紀の貿易とイスラム陶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94: 85-144。

弓場紀知

- 1995 〈北宋初期の紀年銘をもつ越州窯青磁をめぐる〉，《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1: 136-14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 1965 《陝西銅川耀州窯》。北京：科學出版社。

今野村樹

- 2003 〈遼代契丹墓の研究——分布、立地、構造について〉，《考古學雜誌》87(3): 1-36。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1993 《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友永植

- 1983 〈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宋朝武班官僚研究その（一）〉，收於氏著，《宋代の社會と文化》，頁 29-68。東京：宋代史研究會。

王 洙

- 1985 《地理新書》（金明昌抄本）。臺北：集文書局。

任世龍

- 1994 〈論「越窯」和「越窯體系」〉，收於南京文化院、東南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4 年會論文集》，東南文化增刊 1 號，頁 58-64。南京：南京博物院。

伊藤郁太郎

2004 〈北宋官窯探訪〉，《陶說》620: 61-76。

朱伯謙

1964 〈浙江東陽象塘窯址調查記〉，《考古》4: 188-190。

1981 《越窯》，中國陶瓷全集4。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

朱亮等

1995 〈洛陽後梁高繼蟾墓發掘簡報〉，《文物》8: 52-59。

江 松

2000 〈再論越窯對定窯的影響〉，《上海博物館集刊》8: 302-317。

李文信

1954 〈義縣清河門遼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8: 163-202。

李輝柄

1973 〈調查浙江鄞縣窯址的收穫〉，《文物》5: 30-40。

李 燾

1961 《續資治通鑑長篇》。臺北：世界書局。

汪慶正（主編）

1996 《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汪慶正等（編）

1991 《中國・美の名寶》。東京：日本放送協會。

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

1984 《京都市埋藏文化財調查概要（昭和57年度）》。京都：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

周 密

1985 《雲煙過眼錄》。北京：中華書局。

周 燁

1984 《清波雜誌》。上海：上海書店。

定縣博物館

1972 〈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8: 39-5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1997 《北宋皇陵》。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金祖明

1959 〈浙江餘姚青瓷窯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3: 107-120。

長谷部樂爾

1967 〈十世紀の中國陶磁〉，《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紀要》3: 179-242。

長谷部樂爾等（編）

1982 《中國陶磁百選》。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俞偉超

1957 〈一九五六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唐墓葬發掘簡報〉，《考古通訊》4: 9-19。

南京博物院等（編）

1963 《江蘇省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姚仲沅

1975 〈浙江臨安板橋的五代墓〉，《文物》8: 66-72。

胡 仔

年代不詳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一，《四庫全書》集部四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孫新民

1988 〈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發掘報告〉，《華夏考古》3: 19-46。

宮崎市定

1965 〈二角五爪龍について〉，收於石田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編，《石田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頁 469-481。東京：東洋文庫。

座右寶刊行會（編）

1977 《世界陶磁全集第 12 卷・宋》。東京：小學館。

徐 松

1957 《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

根津美術館（編）

1988 《唐磁》。東京：根津美術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

2002 《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4 〈浙江鄞縣古瓷窯址調查記要〉，《考古》4: 182-187。

1975 〈杭州、臨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圖和秘色瓷〉，《考古》3: 186-194。

浙江省地名委員會

1988 《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館（編）

2000 《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

貢 昌

1985 〈浙江東陽南市塔出土青瓷〉，《考古》1: 96、87。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

1992 〈唐惠昭太子陵發掘報告〉。西安：三秦出版社。

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組

2003 《澎湖內垵中屯歷史考古研究成果報告》。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家文物局圖錄編輯委員會

1997 《國寶——中國歷史文物精華展》。香港：香港藝術館。

宿 白

1957 《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張玉蘭

2000 〈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 4-34。

張廣立

1986 〈宋陵石雕紋飾與《營造法式》的「石作制度」〉，收於中國考古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頁 254-280。北京：科學出版社。

梅原郁

1984 〈宋代の武階〉，《東方學報》56: 217-268。

紹興市文管會

1981 〈紹興上灶官山越窯調查〉，《文物》10: 43-47。

莊季裕

1966 《雞肋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陳克倫

2002 〈宋代越窯編年的考古學考察——兼論寺龍口窯址的分期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9: 234-245。

陳信雄

1994 《越窯在澎湖——五代十國大量越窯精品的發現》。臺南：文山書局。

陳相偉等

1973 〈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一號遼墓發掘簡報〉，《文物》8: 2-18。

陳萬里

1937 《越器圖錄》。上海：中華書局。

1951 〈汝窯的我見〉，《文物參考資料》2: 46-53。

1955 〈我對耀瓷的初步認識〉，《文物參考資料》4: 72-74。

彭 柯

1992 〈蒙東、遼西地區遼墓分期與分區探討〉，收於陳克倫編，《文博研究論集》，頁 254-2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森田勉

1995[1979] 〈毛彫文様のある二、三の青磁について〉，原刊於《古文化論叢》6，頁碼不詳，後收於中島恒次郎、森田レイ子編，《大宰府陶磁器研究——森田勉氏追悼論文集》，頁 101-108。福岡：森田勉氏遺稿集・追悼集刊行會。

1982 〈北九州地方から出土する越州窯青磁の様相〉，《考古學ジャーナル》臨時增刊號：15-21。

森達也

2002 〈越窯青瓷碗の兩個體系——玉璧底碗和圈足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5: 140-144。

逸翁美術館

1992 《ゆたかな日々の彩り中國陶磁》。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

馮先銘

1973 〈我國陶瓷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從中國出土文物展覽陶瓷展品談起〉，《文物》7: 20-29。

1981 〈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穫〉，《故宮博物院院刊》1: 3-27、50。

1981 《定窯》，中國陶瓷全集 9。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

1992 〈倣古瓷出現的歷史條件與種類〉，《中華文物學會年刊》，頁 24-32。

1996 《古陶瓷鑑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黃秀純等

1984 〈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3: 361-381。

慈溪市博物館（編）

2002 《上林湖越窯》。北京：科學出版社。

愛宕松男

1974 〈宋代、陶瓷器産業の成立とその發展（上）〉，《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24: 1-48。

楊 晶

1995 〈略論雞冠壺〉，《考古》7: 632-639。

楊 寬

1987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臺北：谷風出版社。

董新林

2004 〈遼代墓葬形制與分期略論〉，《考古》8: 62-75。

熊克（著）、顧吉辰等（點校）

1984 《中興小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1973 《下山門遺跡》，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23 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1980 《福岡市多々良込田遺跡 II 福岡市東區多の津所在遺跡群の調査》，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53 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 1982 《福岡市海の中道遺跡》，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 87 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 1985 《福岡市多々良込田遺跡 III 福岡市東區多の津所在遺跡群の調査》，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 121 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 1991 《徳永遺跡国道 202 號線今宿バイパス關係埋藏文化調査報告 II》，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 242 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 齊曉光
1996 〈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 4-32。
- 劉和惠等
1977 〈鎮江句容出土的幾件五代、北宋瓷器〉，《文物》10: 90-92。
- 劉建國
1985 〈江蘇鎮江唐墓〉，《考古》2: 131-148。
- 鄭國珍、栗建安、田中克子
1991 〈福州懷安窯貿易陶磁研究〉，《博多研究會誌》7: 137-204。
- 鄭 隆
1981 〈內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遼代壁畫墓〉，《考古學集刊》1: 231-243。
- 橫田賢次郎、森田勉
1978 〈大宰府出土の輸入中國陶磁について——型式分類と編年を中心として〉，《九州歷史資料館研究論集》4: 1-26。
- 錢鏞等
1957 〈蘇州虎丘雲岩寺塔發現文物內容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1: 38-45。
- 龜井明德
1975 〈日本出土の越州窯陶磁器の諸問題〉，《九州歷史資料館研究論集》1: 51-97。
1986 《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
2002 〈越州窯と龍泉窯——轉換期の青瓷窯〉，收於東洋陶磁學會編，《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狀》，頁 58-63。東京：東洋陶磁學會。
- 謝明良
2000 〈記皮囊式壺〉，《故宮文物月刊》18(1): 46-63。
2004 〈略談對蝶紋〉，《故宮文物月刊》22(8): 24-39。
- 關口廣次
1983 〈小山富士夫先生採集の定窯窯址陶磁片について〉，收於根津美術館編，《定窯白磁》，頁 92-108。東京：根津美術館。
- Bernet, Parke
1980 *Important Chinese Ceramic and Works of Art, The Collection of Mr. and Mrs. Eugene Bernat*. New York: Sotheby's.
- Flecker, Michael
2002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Oxford, England: Archaeo Press.
- Hobson, R.L.
1934 *A 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 London: The Stourton Press.
- Hughes-Stanton, P., and Rose, Kerr
1981 *Kiln Sites of Ancient China*. Hong Kong: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 Loehr, Max
1950 "Dated Pieces of Yüeh Ware." *Far Eastern Ceramic Bulletin* 2(6): 120-125.

Ronquillo, Wilfredo P. and Rita C. Tan

- 1994 "Yue, Yue-Type Ware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Butuan, Philippine." In Ho, Chuimei, ed.,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 pp. 251-264.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itehouse, David

- 1971 "EXCAVATIONS AT SĪRĀF Fourth Interim Report." *IRAN IX*: 1-17.

Categorization of *Yüeh* Celadon Wares Recovered in the Taiwan Straits

Ming-liang Hsieh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addresses two groups of objects. The first are a series of Yüeh-type celadon wares that were recovered from the Taiwan Straits and are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second are Yüeh-type samples gathered on the P'eng-hu Islands and recorded in the book *Yüeh-yao tsai P'eng-hu*. The typological categorization made in this essay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investigating the chronology of the wares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relevant archeological evidence and several other Yüeh-style celadons inscribed with the character *yung*. The investigation concludes that the Yüeh ware samples recovered from the Taiwan Straits span over a long stretch of time from late T'ang through Northern Sung,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pieces dated back to early Northern Sung period.

Keywords: Yüeh ware, Taiwan Straits, P'eng-hu, celadon, shipwrecks